

ISSN 1997-3721

師大台灣史學報 No. 14

2021年12月31日出刊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TAIWAN

再見南國：臺北公會堂的興建及其空間意義之建構與變遷

潘宗億

再見南國：臺北公會堂的興建及其空間意義之建構與變遷*

潘宗億**

摘要

本文作為臺北「歷史記憶區」研究之起點，在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地方志、官民報刊、口述訪談、日記、文藝創作與相關研究論著的詮釋基礎上，深入考察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興建過程，並進而具體探析其空間意義之時代特性與建構歷程和變遷，從中兼及臺北公會堂建設及其一隅空間意義認知之社群差異與多元性。

首先，在簡述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至戰後臺北中山堂一地空間生命史的基礎上，本文聚焦探究日治初期總督府舊廳舍拆遷至臺北公會堂完成興建始末，具體分析其由倡議、動工到落成，尤在擇定建築地點所歷經之一波三折，及其所涉記憶、族群差異與文物保存因素。其次，本文論證日本公會堂興築的宏觀歷史脈絡與臺北公會堂誕生於接近戰爭爆發與後續戰時體制時期的微觀時代特性，進而考察臺北公會堂經各式紀念性、儀式性、展示性與藝文性活動，成為展演國民精神總動員與皇民奉公運動等官方意識形態與歷史論述的場域，從而構成臺民日本國族認同形塑之空間。

本文之研究成果，置於日治時期到戰後臺灣歷史的發展軌跡，除了可以突顯臺北

* 本文曾於 2014 年 10 月 23 日以〈臺北「歷史記憶區」之建構與意義變遷初探：以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為中心〉為題發表於「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所主辦之「第六屆臺北學：臺北建城 130 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記憶與地景：臺北城市變遷的多重詮釋）」，再經修訂後投稿《師大臺灣史學報》，感謝當時的研討會論文評論人，以及三位期刊匿名審查者的修改意見，使本文之論證得以更臻完善，但凡內容有任何缺失，文責自負。此外，本文為科技部多年期計畫「臺北『歷史記憶區』之建構與意義變遷研究之一：從『公會堂』到『中山堂』」（MOST 102-2410-H-259-078-MY2）第一年研究成果，期間幸得黃弘麟、王冠中與林宜貞等研究助理於文獻蒐集等各方面之細心襄助，本文方得順利完成，特此致謝。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公會堂官式空間意義之時代性、變遷性與多元性之外，也是後續研究戰後臺北中山堂空間生命史之基礎，尤可檢視其中「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興建爭議所涉記憶與認同政治，裨利未來逐一探析臺北「歷史記憶區」中諸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中正紀念堂、凱達格蘭大道、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自由廣場與反貪腐民主廣場等臺灣歷史「記憶所繫之處」之空間建構與變遷歷程。

關鍵詞：臺北公會堂、臺北市中山堂、臺北歷史記憶區、記憶所繫之處、國族認同

一、前言

自近代民族國家發微以來，透過首都國族記憶空間建構，以歷史性與紀念性建築和機制，具體化「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共享之過去與記憶，作為形塑國族認同的合理化技術，是政治現代性的物質基礎。¹ 此一「紀念物崇拜」(modern cult of monuments) 的趨勢，可見諸北京天安門廣場、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 (National Mall)、莫斯科紅場 (Red Square)、新柏林「歐洲被迫害猶太人紀念碑」(The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開羅解放廣場 (Tahrir Square) 與首爾光化門廣場等國族「歷史記憶區」之建構歷程。以國族記憶建構之物質文化基礎的視角觀之，諸般國家首都的歷史性與紀念性等「歷史記憶區」空間，均可謂其所屬國族的「記憶所繫之處 (Lieux de Mémoire)」。²

臺北也有個「歷史記憶區」，可見諸般承載臺灣歷史關鍵時刻的「記憶所繫之處」。臺北「歷史記憶區」分布範圍約等同於博愛特區及其周邊空間，隨

¹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pp. 141-143; Alois Riegl, "The Modern Cult of Monuments: Its Character and Its Origin," *Oppositions* 25 (Fall 1982), pp. 21-51; Daum, Andreas W. and Mauch, Christof, ed., *Berlin-Washington, 1800-2000: Capital Citie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sp. pp. 3-30; Françoise Choay, *The Invention of the Historic Monu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esp. chapters 4-6; Dan Ben-Amos and Lillane Weissberg, ed.,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² 「記憶所繫之處」一詞援引自 Pierre Nora 所著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Spring 1989), pp. 7-24; 此處「記憶所繫之處」之中譯乃參考戴麗娟，參閱 Pierre Nora 編，《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出版，2012)。根據諾哈 (Pierre Nora)，「記憶所繫之處」意指具物質性、功能性與象徵性之記憶載體；所謂物質性，即集體記憶之化身變形，如教科書或紀念性建築；功能性則指該化身變形之載體，且具實質政治、社會與文化功能，例如紀念日或國慶儀式；象徵性則意指記憶載體指涉社會群體與認同，例如國家級紀念碑。基於「記憶所繫之處」概念，諾哈主編《記憶所繫之處》一書探究現代法國國族認同建構與記憶變遷史，主題涵蓋國慶日、馬賽曲、聖女貞德、艾菲爾鐵塔、環法自行車賽、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與拉維斯 (Ernest Lavisse, 1842-1922) 的《法國史》(Histoire de France) 等。相關討論參閱：潘宗億，〈歷史記憶研究的理論、實踐與展望〉，收於蔣竹山編，《當代歷史學新趨勢：理論、方法與實踐》(臺北：聯經，2019)，頁 255。

時光流變與政權遞嬗，今中山堂、總統府、中正紀念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凱達格蘭大道、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自由廣場、反貪腐民主廣場等物質性、功能性與象徵性兼具之「記憶所繫之處」，先後出現在臺北地景，成為具形、儲藏與傳遞臺灣戰後歷史特定關鍵時刻的記憶空間。

今中山堂所在地，可謂臺北「歷史記憶區」戰後形構生命史中最早一隅，是故臺北公會堂成為本文探究臺北「歷史記憶區」之起點，並以其興建歷程與空間意義之官方建構及其時代特性為探討中心。極具歷史象徵意義的是，戰後中山堂所藏「南國」或稱「水牛群像」的黃土水（1895-1930）浮雕作品，在昭和 12 年（1937）即已陳列於臺北公會堂，³ 故本文以「再見南國」為名，寓意曾藏於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的黃土水最後遺作「南國」，亦「再見」於戰後改名為臺北中山堂之隅，成為見證同一空間生命史轉折與意義變遷的「記憶所繫之處」。

今日所稱中山堂之建築，乃興建於日治時期的臺北公會堂。臺北公會堂一地，原矗立曾為日本治臺「始政儀式」與日治初期總督府舊廳舍的清領時期建物，在昭和 7 年（1932）底因興建臺北公會堂之目的而被拆遷。從昭和 2 年（1927）7 月臺北市役所提出以興建臺北公會堂作為「昭和三年御大典記念事業」⁴ 起，經將近十年一波三折，終在昭和 11 年（1936）底完工。⁵ 臺北公會堂建築空間正式落成之前，已成為「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主要儀式與展覽會場，⁶ 正式啟用之後，平常時期應作為日本殖民臺灣統御、公民教化與文藝娛樂活動之公共空間，因戰時體制迅速成為官方進行國民精神總動員與

³ 朱家瑩，〈臺灣日治時期的公共雕塑〉，《雕塑研究》7（2012 年 3 月），頁 42-44。

⁴ 〈臺北市公會堂の建設 大典記念事業とし實現せよ〉，《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7 月 6 日，版 2。

⁵ 不著撰人，《臺北市公會堂建築工事概要》（臺北：出版者不詳，1936），頁 2；井手薰，〈臺北市公會堂落成式に於ける工事報告〉，《臺灣建築會誌》9：3（1937 年 6 月），頁 250。

⁶ 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臺北：臺灣博覽會誌，1939），頁 4、9、67、533-549、619-629。

皇民奉公運動等政治宣傳之所，從而成為建構臺灣人日本國族認同而官式意義濃厚的空間。民國 34 年（1945）10 月 25 日，臺北公會堂成為日本總督安藤利吉（1884-1946）簽署投降書地點，同年 12 月 19 日隨全臺公會堂易名為中山堂，⁷ 而次年同日，首度來臺的蔣介石出席在中山堂舉辦的臺灣光復節週年紀念大會，與臺灣群眾進行首次公開接觸，⁸ 形同臺灣光復記憶場域。

戰後臺北公會堂易名為中山堂，而其官式空間意義之重構，乃國民黨政權統治臺灣實施「中國化」⁹ 政策之一環，如同戰後臺灣街道易名一般，可謂國民黨在中國為合法化與鞏固其政權，而創造諸如中山裝、中山陵與中山堂等孫中山符號崇拜之遺緒，進而延續而在臺開闢中山堂「培育人民共同信仰」以作為國族認同建構之基礎，¹⁰ 並隨戰後〈修建中山堂辦法〉於民國 35 年（1946）頒行臺灣，漸漸普及。¹¹ 因此，中山堂不但成為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的物質化與空間化基礎，在冷戰時期更是宣示國民黨政權反共抗俄與復興中華文化等論述之空間。

再者，中山堂也可謂戰後臺灣歷史「記憶所繫之處」。戰後初期，中山堂

⁷ 臺北市中山堂，「大事記」，<https://reurl.cc/vgVaD1>，2021 年 11 月 16 日瀏覽；曾筱甯，〈眾樂之堂：臺北中山堂（公會堂）藝文展演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頁 74。

⁸ 葉惠芬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第 67 冊》，（臺北：國史館，2012），頁 362-368。

⁹ 關於國民黨政權於戰後臺灣施行「中國化」政策之種種及其影響，可參閱：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2007）；若林正文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 92-110。

¹⁰ 〈中山堂修建辦法〉，《國民政府》，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100-00029；「奉令抄發修建中山堂辦法令仰遵照由」〈普通法令〉，《臺灣高等法院》，新北：國家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50400000F/0039/牘/113/1/001。自 1925 年 4 月 1 日國民黨中執會倡建中山堂，並於 1926 年成立「籌建總理紀念堂委員會」以來，中山堂作為「國家的象徵」與「鞏固黨國的基礎」，開始出現在中國全國地景。參閱：陳蘊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325-389；同樣地，國民黨治理臺灣後於地名與街道名稱之改變，均涉及命名與改名之政治學，是為國族認同建構基礎的記憶空間（中國）想像，參閱：H. Leitner and Peter Kang（康培德），“Contested Urban Landscapes of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Taipei,” *Ecumene* 6 (April 1999), pp. 214-233.

¹¹ 「奉令抄發修建中山堂辦法令仰遵照由」〈普通法令〉。

曾為「臺灣光復致敬團」成果報告與召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所，¹²也曾作為臺灣立法院、¹³ 國民大會、¹⁴ 臺北市參議會與市議會¹⁵ 等政治集會議場，且又因其官方色彩，自戒嚴末期以來，其建築前的廣場，經常成為被在野力量佔據而提出解嚴、中央民代全面改選、臺北市長民選、總統民選等民主改革訴求的另類場域，而益使該所在的空間意義更形豐富而多元。1980 年代末，隨著野百合學運之發展，中山堂不再是臺灣政治運動中心，迅速被中正紀念堂所取代。直到民國 84 年（1995），因國民黨政府推動在中山堂廣場興建「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引起臺灣各社群關於二戰與臺灣光復的記憶戰爭，中山堂再度短暫成為焦點，而其空間意義也再經變遷、延展與增生。進入 21 世紀，其政治色彩較為淡化，文藝色彩更加突出，但作為抗日戰爭勝利與臺灣光復的紀念性空間，因各種歷史展覽之舉辦與紀念碑之興建，其官式空間意義仍持續存在。綜合上述，中山堂可謂戰後臺灣歷史關鍵時刻的「記憶所繫之處」。

¹² 許雪姬，〈「臺灣光復致敬團」的任務及其影響〉，《臺灣史研究》18：2（2011 年 6 月），頁 128；張炎憲、胡慧玲，〈臺北都會二二八〉（臺北：吳三連基金會，1996），頁 22、82、84、86。

¹³ 立法院於 1950 年 2 月 24 日在臺北中山堂首次集會，自此並以中山堂為臨時院址。立法院於 1957 年 9 月申請中山南路 1 號原臺灣省政府農林廳辦公房屋使用權，最後隨 1959 年 12 月 31 日第一屆二十四會期之結束，正式於 1960 年遷入現址。參閱：〈立法院第五會期 今日在臺首次集會各立委準備提出臨時緊急動議 要求總統恢復行使職權〉，《中央日報》，1950 年 2 月 24 日，版 1；〈台北市中山南路壹號房屋移交立法院使用〉，《臺灣省政府》，新北：國家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7500000A/0047/017.1/22。

¹⁴ 國民大會於 1954 年 2 月 19 日在臺北市中山堂首次集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並於 1959 年 9 月將會址遷入中山堂。在中山樓落成之前，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三、四次會議也都在中山堂舉行。之後，國民大會秘書處於 1990 年 6 月 22 日將會址遷至中華路辦公大樓。參閱：〈首屆國民大會二次會議昨隆重開幕〉，《中央日報》，1954 年 2 月 21 日，版 1；〈國民大會會址將遷至中山堂〉，《中央日報》，1959 年 6 月 27 日，版 4；〈中山堂「國民大會」街牌取下改懸於中華路國大正門〉，《中央日報》，1990 年 6 月 23 日，版 5。

¹⁵ 臺北市首屆參議會於 1946 年 4 月 15 日於臺北市中山堂召開，後因改制，臺北市參議會與臺北市議會正式於 1950 年 12 月 2 日在中山堂交接，並在市議會忠孝西路新大樓於 1964 年 8 月 3 日落成之前，以中山堂為會議場所，參閱：臺北市中山堂，「大事記」，<https://reurl.cc/vgVaD1>，2021 年 11 月 16 日瀏覽；〈市議會新廈竣工正式遷入辦公〉，《中央日報》，1964 年 8 月 2 日，版 3。

臺北公會堂與中山堂在臺灣 20 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中具重要意義，但相關研究著述卻相對有限。目前所見中山堂相關論述，以方志、史蹟與建築述介為主，兼及硬體整修或文資保存報告書，都有助初步認識臺北公會堂或中山堂的歷史軌跡，但以該空間為主體的長時段歷史研究仍較少。21 世紀初曾出現一部以回憶中山堂為主題的文集，呈現臺灣多元社群對中山堂空間意義之認知，雖非學術論著，但有助未來從歷史記憶視角考察戰後中山堂生命史。¹⁶

李瑞宗嘗試以老照片、建築與地理位置之交叉比對，論證臺北公會堂原址建物為「欽差行臺」，而非「布政使司衙門」，但關鍵處仍缺乏歷史文獻佐證。¹⁷ 在溫祝玲就日治時期井手薰在臺建築作品的研究中，以專章討論臺北公會堂，雖未深入探討建築興建過程及其落成後之功能，對本文綜述臺北公會堂之建築與空間設計特色，有所裨益。¹⁸ 同樣地，王紹傑考察日治時期臺灣公會堂建築，其中一節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簡述臺北公會堂興建過程，雖附上珍貴之建築平面圖與興建工程照片，惜未具體深論。¹⁹ 曾筱甯則從藝文展演視角，聚焦考察戰後臺北中山堂之多元功能與意義，尤於音樂性文化活動多所著墨，而其以新藤浩伸提議之日本公會堂於空間功能之原初規劃與實際情況的內在矛盾說切入，突出其「屬於人民」的藝文空間意涵，尤值得參考，惜亦未深論公會堂興建地點與過程。²⁰ 其他諸如臺南市與基隆市公會堂相關論著與建築調查報告，亦可作為探究臺北公會堂建設歷史脈絡與功能之比較對象。²¹ 總之，目前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之興建過

¹⁶ 人間副刊主編，《回到中山堂》（臺北：臺北市文化局，2002）。

¹⁷ 李瑞宗，《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臺的新透視》（臺北：南天書局，2007）。

¹⁸ 溫祝玲，〈空間元素的並列到調和：以日治時期井手薰主導之建築活動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 89-136。

¹⁹ 王紹傑，〈臺灣日治時期公會堂建築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頁 164-171。

²⁰ 曾筱甯，〈眾樂之堂：臺北中山堂（公會堂）藝文展演研究〉。

²¹ 柯勝釗，〈日治時期台南社會活動之研究——以台南公會堂為例〉（臺南：國立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公會堂之研究——兼論基隆地方社會的發展〉，《海洋文化學刊》3（2007 年 12 月），頁 75-105；郭俊沛，《彰化縣歷史建築：彰化市中山堂（公會堂）調查研究》（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5）；郭俊沛，《彰化

程及其至戰後中山堂一隅空間生命史猶待細探，而其作為 20 世紀以來臺灣的「記憶所繫之處」，更有進行長時段系統性歷史研究之必要。是故，作為起點，本文以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之興建過程及其空間意義之建構與變遷為探討中心。

本文作為臺北「歷史記憶區」官方建構與意義變遷研究之起點，在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地方志、官民報刊、口述訪談、日記、文藝創作與相關研究論著等文獻的詮釋基礎上，考察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興建過程，並進而論及日本公會堂興築的宏觀脈絡與其誕生於接近戰爭爆發與後續戰時體制時期的微觀時代特性，從中具體探析臺北公會堂功能及其空間意義的官方建構色彩，以及日本學者新藤浩伸所揭櫫之公會堂在設置初衷與具體實踐於市民集會、社會教化與國家象徵之間所呈現的矛盾性。基於此論旨，本文在上述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至戰後臺北中山堂一地空間生命史變遷的基礎上，第二部分檢視日治初期總督府舊廳舍到臺北公會堂之變遷歷程，具體探究臺北公會堂興建爭議及其遲遲無法動工之因，尤在擇定建築地點所歷經之一波三折與空間意義認知所涉之記憶、族群差異與文物保存因素。其次，本文第三部分進一步爬梳與歸納戰爭時期臺北公會堂各式活動類型，剖析具時代特性的臺北公會堂，經各式紀念性、儀式性、展示性與藝文性活動，成為展演國民精神總動員與皇民奉公運動等官方歷史論述與政治意識形態的場域，從而形構為臺灣島民日本國族認同形塑空間之歷程，而關乎公會堂建築細節與特色則已有專論涉及，本文不作深入探討。最後，本文代結論，除了歸納本文主要論點之外，並以戰後中山堂官式空間意義的歸納，展望猶待進一步深論的問題與可行研究方向。

進入正文論證之前，有必要先界定臺北公會堂或中山堂一隅空間及其所據建築。戰後臺北中山堂沿用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建築，而臺北公會堂興建地點也確為日治初期總督府舊廳舍（1895-1919）所在區域，但根據已知文獻，總督府舊廳舍所沿用之清領時期建築名稱，卻仍不確定。目前所見日治時期臺北市

縣歷史建築彰化市中山堂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6）。

史，或稱其為布政使司衙門，或未具體指名。²² 戰後初期臺北市志或臺灣省通志，或稱其為布政使司衙門，或稱巡撫衙門。²³ 臺北文獻會於 1960 與 1980 年代所編《臺北市志》，則開始固定稱臺北公會堂原址建物為布政使司衙門，²⁴ 並被引用於建築學者如李乾朗所著《臺灣建築史》等史蹟論著或報告書。²⁵

但根據其他日治時期文獻，臺北公會堂所在地總督府舊廳舍建築，不是巡撫衙門，也不是布政使司衙門。首先，明治 28 年（1895）5 月 25 日，臺灣民主國成立時，唐景崧以巡撫衙門為總統府，在日軍進臺北城時，巡撫衙門建築大部份已經燒毀，不可能充作總督府舊廳舍。²⁶ 其次，日人文獻《北白川宮》紀錄日軍入臺北城時巡撫衙門已燒毀，也具體指出樺山總督選擇以原來「由中國渡海高級官員旅宿」所在之「行臺」，作為始政式場所與總督和民政長官廳舍，

²² 根據《臺北市史》，樺山資紀（1837-1922）於 1895 年 6 月 14 日率文武百官進臺北城後，以「清朝時代官衙建物『行轅』與布政使司衙門充當總督府廳舍」，但又稱該建物乃巡撫劉銘傳（1836-1896）所建，「供本國政府大官渡海來臺時做為迎賓館與當做公廨者」，參閱：田中一二編，《臺北市史》（臺北：臺灣通信社，1931），頁 183-184；田中一二編、李朝熙譯，《臺北市史：昭和六年》（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8），頁 115；《臺北市政二十年史》則僅記臺北公會堂原址為舊總督府廳舍，未說明前清建物名稱，參閱：山村光尊編，《臺北市政二十年史》（臺北：臺北市役所，1940），頁 801。

²³ 例如，《臺北市志稿》於卷三政制志建設篇稱「布政使司衙門……今中山堂即在其原址改建者」（頁 131），卻又在同卷第七章公有建築中稱中山堂的「基地原屬清巡撫衙門遺址」（頁 144）；另在卷八文化志名勝古蹟篇中有關動物園與植物園之照片稱其中建物為「舊布政衙門」，又於「中山堂」條目中稱其「原址乃清季之撫臺衙」（頁 73），參閱：黃春成纂修，《臺北市志稿卷八 文化志名勝古蹟篇》（臺北：臺北文獻委員會，1958），頁 73；朱萬里纂修，《臺北市志稿卷三 政制志建設篇》（臺北：臺北文獻委員會，1957），頁 131、144；《臺灣省通志稿》與《臺灣省通志》相關章節，均稱中山堂「前為清代臺灣撫臺衙署。」參閱：陶文輝、曹甲乙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卷一 土地志勝蹟篇》（臺北：臺灣省文獻會，1959），頁 181；李汝和主修，《臺灣省通志卷一 土地志勝蹟篇》（臺北：臺灣省文獻會，1970），頁 10。

²⁴ 朱萬里等纂修，《臺北市志卷三 政制志建設篇、戶政篇、役政篇》（臺北：臺北文獻會，1966），頁 128、133、136、146；王月鏡纂修，《臺北市志卷八 文化志勝蹟篇》（臺北：臺北文獻會，1988），頁 16、24。

²⁵ 例如：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雄獅圖書，1979），頁 287；李乾朗，《台灣近代建築——起源與早期之發展 1860-1945》（臺北：雄獅圖書，1996），頁 144；傅朝卿，《日治時期臺灣建築 1895-1945》（臺北：大地地理，1999），頁 91、141；葉倫會，《台北城的故事》（臺北：蘭臺出版社，2006），頁 33-39；楊仁江，《臺閩地區第二級古蹟檔案圖說》（臺北：內政部，1995），頁 50-57。

²⁶ 稻垣其外，《北白川宮》（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1937），頁 424-428。

並以「行臺」東方布政使司衙門為陸軍局廳舍，也說明「行臺」以北為已大部分燒毀之巡撫衙門，且又於「行臺」圖片說明中稱其為「欽使行轅所」。²⁷ 同一時期之中文文獻，如連橫著《臺灣通史》與許南英著《窺園留草》，皆曾提及「欽差行臺」於光緒 18 年（1892）建於臺北。²⁸ 同樣記述，也出現在戰後臺灣方志之中，如《重修臺灣省通志》，稱光緒 18 年「林維源建欽差行臺於臺北」。²⁹ 換言之，《北白川宮》所指「行臺」或「欽使行轅所」，有可能即為林維源所捐建之「欽差行臺」。亦即，臺北公會堂原址的日治初期總督府舊廳舍所在前清建築，有可能是「欽差行臺」。就此，當代學者李瑞宗藉「欽差行臺」與「布政使司衙門」老照片，從建築物正門造型、環境與兩建築空間設計之比較對照，認為日治初期總督府舊廳舍建物應為「欽差行臺」，並獲臺北市文化局認可，於民國 102 年（2013）2 月 1 日正式公告，將植物園內前清建築由「布政使司衙門」改名為「欽差行臺」。³⁰

然而，上述日文文獻大抵出現於 1920 或 1930 年代前後，是故以欽差行臺或布政使司衙門稱日治初期總督府舊廳舍所在前清建物名稱，仍有疑慮，而此一疑慮或可從日治初期臺北地圖獲得初步解答。首先，如圖一由「臺灣總督府製圖部」於明治 28 年（1895）繪製之《臺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圖》所示，當時的「總督府」即座落於「舊布政使衙門」西方，呼應《北白川宮》文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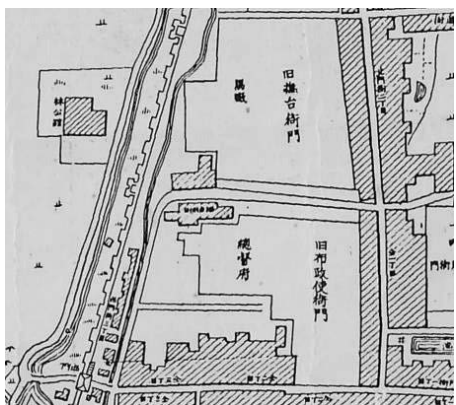
²⁷ 稻垣其外，《北白川宮》，頁 441-442、471；類似記述也見：橋本白水，《島の都》（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26），頁 33；臺北市役所，《臺北市案內》（臺北：臺北市役所，1928），頁 19-20；原幹州，《臺灣史蹟》（臺北：拓務臺灣評論支社，1937），頁 4-5。

²⁸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眾文出版社，1979），頁 88；許南英，《窺園留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研究叢刊第 147 種，1962；1933 年原刊），頁 225。

²⁹ 劉顏寧總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一 大事志》，（臺北：臺灣省文獻會，1984），頁 226；板橋林家清領末期捐獻之頻繁與官紳關係之良好，林維源捐建「欽差行臺」實有可能；根據黃富三之研究，板橋林家清領末期確常捐獻官衙，尤在劉銘傳時期，捐獻與官紳關係達於空前，林維源因而貴為京官。參閱：黃富三，〈清季臺灣之外來衝擊與官紳關係：以板橋林家之捐獻為例〉，《臺灣文獻》62：4（2011 年 12 月），頁 131-159。

³⁰ 參見李瑞宗，《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臺的新透視》，頁 37-39、127-128、130、135-136、140-141、144；臺北市文化局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已於 2013 年 2 月 1 日公告將植物園內所存前清古蹟從布政使司衙門正名為欽差行臺，參「北市文化二字第 10230278400 號」文。

關於樺山總督以「行臺」為始政式會場與總督府廳舍，又以「行臺」以東舊布政使司衙門為陸軍局廳舍之紀錄。而且，以今 google 地圖與《臺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圖》疊圖比對，今中山堂部份空間即位於圖一中「總督府」及其周圍區域。³¹



圖一 《臺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圖》一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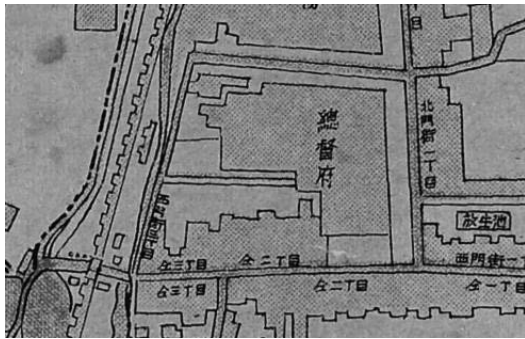


圖二 Google 地圖與圖一疊圖

而類似觀察，亦可見繪於明治 30 年（1897）的圖三《日據初期臺北市街圖》與 google 地圖的疊圖比對之中，雖其所見總督府區域較圖二為廣，但由疊圖對比亦可見今中山堂僅分布於該「總督府」區域西半部，與《北白川宮》記述不完全衝突。³²

³¹ 臺灣總督府製圖部，《臺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圖》，「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2021 年 8 月 10 日瀏覽。

³² 臺灣總督府製圖部，《日據初期臺北市街圖》，「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2021 年 8 月 10 日瀏覽。



圖三 《日據初期臺北市街地圖》
部份



圖四 Google 地圖與圖三疊圖

綜合上述文字與地圖文獻之討論與交叉比對，可幾乎完全確定今山中堂所在地清領時期建物，絕非巡撫衙門，亦非布政使司衙門，而其座落於欽差行臺所在地的可能性亦相當高，卻不能完全確定，猶待進一步考證確認。是故，本文於聚焦探究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之興建及其官式空間意義之建構與變遷的論證過程中，將不特別指明日治初期總督與民政長官廳舍建築之正式名稱，而以前清建物稱之，特此說明。

二、從「總督府」到「臺北公會堂」

隨臺灣統治權力遞嬗，原本前清建物成為明治 28 年（1895）6 月 17 日始政儀式地點，³³ 也成為日治初期總督與民政長官辦公廳舍。換言之，在大正 8 年（1919）3 月新總督府廳舍完工之前，總督府舊廳舍仍是日本治臺初期政治中心，而其建築所在空間意義亦由此開始歷經新生與轉折。

在總督府新廳舍落成之後，總督府舊廳舍並未完全喪失功能，除了改為機關學校廳舍，也常舉辦重要的紀念儀式或展覽。例如，大正 8 年（1919）4 月

³³ 稻垣其外，《北白川宮》，頁 471-473；〈臺灣總督府始政第三紀念會〉，《臺灣總督府報》第 102 號，1897 年 6 月 19 日，頁 31。

1 日總督府從舊廳舍遷至新總督府，舊廳舍則先後成為高等商業學校、農林專門學校、臺北盲啞學校等校舍，部分成為公設質鋪等場所。³⁴ 大正 14 年(1925) 6 月 17 日起，總督府舉辦為期 12 天的「始政三十年記念展覽會」彰顯日本治臺政績，舊廳舍則為第三會場「交通館」場地，展示郵政與鐵路交通等事業成果。³⁵ 當時總督伊澤多喜男(1869-1949)即指出，展覽會之目的在於展示「日本治理時期的成功與偉大」，藉以「緬懷先人功績」，並希望「結合官民，共策本島文化發達、民生安定」。³⁶ 值此紀念之日，藉由展示與儀式活動，總督府在宣傳殖民現代化建設成績之外，意在回顧治臺歷史，藉以展望「結合官民，共策本島文化發達、民生安定」之未來。³⁷

總督府舊廳舍在拆遷之前，也曾舉辦各式美術展覽會，其中最要者莫過於昭和 6 年(1931) 5 月 9 日至 10 日的黃土水(1895-1930)遺作展覽會，其陳列了包括入選帝展的吹笛蕃童、甘露水和婦女立像等黃氏作品。之後，這些作品的石膏原型與成品，由黃氏遺孀廖秋桂從東京搬回，其中即包括沒有在展覽會陳列的「南國」(或稱「水牛群像」)浮雕，而此以四隻水牛、兩名牧童、芭蕉背景構圖的浮雕傑作，則於昭和 12 年(1937)再由廖秋桂捐贈臺北市役所，後陳列於臺北公會堂，成為見證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到戰後中

³⁴ 〈舊廳舍引繼ノ件(高商外二校)〉，《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265 冊第 28 號；〈舊廳舍引繼ノ件(農林專門學校)〉，《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265 冊第 62 號；〈舊廳舍引繼ノ件(商業學校)〉，《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265 冊第 63 號；〈總督府舊廳舍二關スル件(高等商業學校、高等農林學校)〉，《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268 冊第 19 號；〈舊廳舍(盲啞學校；木村謹吾)〉，《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310 冊第 13 號；〈舊廳舍引繼ノ件(台北廳)〉，《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265 冊第 42 號；〈舊廳舍引繼ノ件(台北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266 冊第 14 號。

³⁵ 赤阪清七，〈臺灣始政三十年記念展覽會〉，《臺灣時報》69(1925 年 7 月)，頁 20；謝國興等主編；陳進盛、曾齡儀、謝明如譯，「三好德三郎回憶錄/卷 2/83 始政 30 週年紀念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三好德三郎回憶錄/卷2/83_始政30週年紀念會，2014 年 6 月 15 日瀏覽。

³⁶ 伊澤多喜男，〈迎始政三十年〉，《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6 月 17 日，版 5。

³⁷ 林品章、林文通，〈日治時期始政三十年記念展覽會之研究〉，《設計學研究》8:1(2005 年 7 月)，頁 1-24。

山堂在名稱與空間意義轉折的「記憶所繫之處」。³⁸ 至今，我們仍可在中山堂看到這件於民國 98 年（2009）3 月 2 日登錄為「國寶」的「鎮堂之寶」。

昭和 11 年（1936）底，臺北公會堂完工，今中山堂一隅之空間意義再經歷變遷與轉折。日本治臺以來，雖在明治 39 年（1906）已可見興建臺北公會堂之輿論，但直到昭和 2 年（1927）7 月，作為紀念裕仁天皇登基的「昭和三年御大典紀念事業」，才成為臺北市役所城市建設計畫一環，³⁹ 且又遲至昭和 7 年（1932）12 月 15 日才正式動工，最後於昭和 11 年（1936）底完工並正式落成。⁴⁰ 如此重要的官式建築，何以耗時如此之久才出現在臺北市地景呢？其間牽扯問題相當複雜，涉及市區改正、政權轉換之際文物保存或拆遷，以及記憶與族群認同等面向之因素。

（一）臺北公會堂之倡議興建

日治時期臺北市需要一個體面的公會堂，卻遲遲未能建成。明治 39 年（1906），臺北各界開始呼籲興築臺北公會堂。明治 39 年（1906）前，臺北市並無設置公會堂之急迫需求，因當時已有「臺北第一有名之公會堂」之稱的「淡水館」。淡水館原為建於清光緒 6 年（1880）的登瀛書院，在日治初期由總督樺山資紀於明治 28 年（1895）裝修並改名為淡水館，先作官員俱樂部，後作公會堂使用，最終因市區改正，於明治 39 年（1906）8 月 16 日遭拆毀。⁴¹

³⁸ 〈黃氏遺作展覽關於舊廳舍〉，《臺灣新民報》，1931 年 5 月 16 日，版 8；井手薰，〈臺北市公會堂落成式に於ける工事報告〉，頁 254；朱家瑩，〈臺灣日治時期的公共雕塑〉，頁 42-44。

³⁹ 〈臺北市公會堂の建設 大典記念事業とし實現せよ〉。

⁴⁰ 不著撰人，〈臺北市公會堂建築工事概要〉，頁 2；井手薰，〈臺北市公會堂落成式に於ける工事報告〉，頁 250。

⁴¹ 〈東瀛書院ヲ修築シテ淡水館ト名附ク〉，《臺灣史料稿本》，1895 年 12 月 18 日（此處篇名中之「東瀛」書院應是易名為「淡水館」的「登瀛」書院之誤，特此說明）；〈淡水館の跡始末〉，《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8 月 11 日，版 5；〈淡水館之今昔〉，《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8 月 12 日，版 5。關於淡水館拆除之因，《臺北市史》稱是因為「罹患蟻害，且亦甚為腐朽，已不堪使用」而欲在原地「興建洋式建物」之故，參閱：田中一二編，《臺北市史》，頁 241-242。

正是在「規模之大、結構之壯，足容數百人而有餘」的淡水館遭到拆除之際，出現設置「臺北公會堂之必要」的呼聲。淡水館拆除當日，《臺灣日日新報》二版頭「論議」欄目刊登〈臺北公會堂之必要〉一文，感嘆淡水館拆除之後，臺北作為「督府所在地之全島大都會」，卻「竟無一公會堂」，並指三市街內地人口達一萬六千人，佔全島內地人口三分之一，且臺北內地人「于地位、于身份、于資力」均較優異，臺北竟缺一公會堂。因此，該文呼籲臺北官民應「奮一臂之力，以設立堂堂之大公會堂」，並認為以「臺北紳士之資力」，興建一座公會堂，「亦無難之有也」。⁴² 〈臺北公會堂之必要〉表達興建公會堂之必要性訴求，首先立基於總督府所在首府缺少一公會堂之現實，再強調三市街區域中具有優異地位、身份與資力之內地人口比例乃全臺最高，實不應該缺少一座公會堂之遺憾。然而，1920年代之前，仍不見公會堂修築之譜。

大正9年（1920）10月1日臺灣地方制度改制施行，臺北設市並設置臺北市協議會，爾後於大正10年（1921）1月1日的臺北市協議會第一次會議首次正式決議，提請臺北市役所興建臺北公會堂。⁴³ 協議會由第一任市尹武藤針五郎（大正9年〔1920〕9月1日至大正13年〔1924〕12月23日）擔任議長，協議員亦皆為官派，但僅具諮詢功能，無執行決議之權。⁴⁴ 故此，公會建築一案，只聞樓梯響。即便如此，臺北市尹武藤針五郎仍於大正12年（1923）通過公告「臺北市公會堂建築積立金設置及管理規程」。⁴⁵ 大正14年（1925），臺北市協議員三卷俊夫（1879-？）發表〈臺北公會堂論〉一文，再三呼籲興建公會

⁴² 〈臺北公會堂之必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8月16日，版2。

⁴³ 三卷俊夫，〈臺北公會堂論〉，《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1月1日，版15。

⁴⁴ 1920年7月臺灣總督府正式公布《臺灣州制》、《臺灣市制》與《臺灣街庄制》，下設置州協議會、市協議會與街庄協議會。以臺北市協議會之組成而言，根據1920年10月1日施行之《臺灣市制》，臺北市協議會由30名會員組成，市尹為當然議長，但皆為官派，且大部份為日人，僅少部分為臺人。就其功能而言，主要在於提供市尹預算、決算、稅賦等各方面之諮詢，未具法定約束力。參閱：〈臺灣州制〉，《臺灣總督府報》第2170號，1920年7月30日，頁56-57；〈臺灣市制〉，《臺灣總督府報》第2170號，1920年7月30日，頁57-59；〈臺灣州制、臺灣廳地方費令、臺灣市制、臺灣街庄制施行ノ件〉，《臺灣總督府報》第2170號，1920年7月30日，頁61。

⁴⁵ 臺北市役所，《臺北市報》號外，1923年4月1日，頁1。

堂，表示雖市政府財政拮据，但臺北作為首都，應興建公會堂作為其體面之「應接室」。⁴⁶ 民間人士也同樣感慨，「住著將近二十萬人」之「堂堂的首都」，竟缺少一個可供集會的公會堂，而必須使用鐵道旅館或戲院，實是「臺北市民的大恥辱」，直呼島都「一個公會堂都沒有，實在奇之又奇」。⁴⁷

此外，部分臺人雖支持興建公會堂，但提醒臺北市役所應注意公會堂的興建地點，於大正 14 年（1925）年末刊載在《臺灣民報》的〈臺北市公會堂的位置呢？〉一文即強調：「要取一個公平的辦法，不要像總督府、臺北醫院、公園和其他一切官衙、公署，盡置在城內。」⁴⁸ 換言之，從臺北公會堂之倡議興建階段伊始，即可見因臺日差異對待所致族群意識之作用。但不論如何，1920 年代中以來，倡議興建臺北公會堂之輿論，愈發強烈。⁴⁹

第二任太田吾一市尹（大正 13 年〔1924〕12 月 23 日至昭和 2 年〔1927〕7 月 27 日）末期，公會堂興建終於露出曙光。昭和 2 年（1927）5 月底，《臺北州報》首公告將以總督府舊廳舍為臺北公會堂建地。⁵⁰ 同年 7 月初，太田吾一市尹宣告公會堂列為次年「昭和三年御大典記念事業」，確定為市政設計畫一環。⁵¹ 因此，臺北市役所趁此機會，將公會堂建設定為「新規事業中之主要者」。⁵²

此際，《臺灣民報》再次提醒臺北當局，應在占臺北人口半數的大稻埕建設公會堂，或在大稻埕、艋舺與城內各建一個公會堂，雖悲觀地認為此一建言在「凡事以日本人為本位的臺灣恐怕是不能通過」。⁵³ 當時臺人預設新建之公

⁴⁶ 三卷俊夫，〈臺北公會堂論〉。

⁴⁷ 〈聖廟的建設與臺北市公會堂〉，《臺灣民報》，1925 年 3 月 1 日，版 3；〈臺北市公會堂的位置呢？〉，《臺灣民報》，1925 年 12 月 27 日，版 8。

⁴⁸ 〈臺北市公會堂的位置呢？〉。

⁴⁹ 〈公會堂に 懂る、臺北市民 新設の聲が再燃し出した〉，《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6 月 1 日，版 5。

⁵⁰ 臺北州，《臺北州報》第 55 號，1927 年 5 月 28 日，頁 150。

⁵¹ 〈臺北市公會堂の建設 大典記念事業とし實現せよ〉。

⁵² 〈臺北市豫算中 新規事業概觀 市衙公會堂其他〉，《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1 月 27 日，版 n04。

⁵³ 〈臺北市公會堂問題〉，《臺灣民報》，1928 年 1 月 29 日，版 3。

會堂將「以日本人為本位」，在在突顯了臺北市官方與民間臺人之間在興建公會堂議題上的認知落差。此乃由於在日治時期的三市街區中，臺人主要居住於大稻埕與艋舺，內地人則居住於城內地區，之後漸擴展至城外的西門以北、南門以南、東門以東地區，而臺北市役所規劃將公會堂設於內地人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內地區，故而臺人源於維護族群利益之考量，直接指明公會堂應建於大稻埕區的主張，而此一於公會堂興建地點的族群利益考量，早已出現於 1920 年代中的《臺灣民報》。

（二）擇定公會堂興建地點之一波三折

昭和 3 年（1928）5 月，第三任市尹田端幸三郎（昭和 2 年〔1927〕7 月 27 日至昭和 4 年〔1929〕4 月 20 日）基於「節約敷地及建築費」之考量，決定在鄰近公設質鋪、靠三線道路西段興建一市政府與公會堂廳舍併立之建築，並具體規畫由市役所土木水道課永島文太郎擔任設計技師，建設一現代式三層樓建築。⁵⁴ 然而，時隔一年，第四任市尹增田秀吉（昭和 4 年〔1929〕4 月 20 日至昭和 6 年〔1931〕5 月 16 日）任內，公會堂興建計畫又有變化。昭和 4 年（1929）5 月，總督府決定興建商品陳列館，提議「以公會堂與商品陳列館設在同一建築物內」，故建築設計與地點需再更張，但預算小幅擴充到 35 萬圓左右。⁵⁵ 7 月，總督府又中止商品陳列館興建計畫，臺北市只好單獨興建公會堂。⁵⁶

昭和 4 年（1929）10 月，總督府舊廳舍原本因為市區改正道路預定地而行將拆除，但總督府營繕課與石塚英藏（1866-1942）總督卻堅持保留，為此

⁵⁴ 〈豫定來秋竣成之 市廳舍及公會堂建于三線路公質邊〉，《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5 月 22 日，版 n04。

⁵⁵ 〈陳列館及公會堂設計案成立 公會堂建設費三十四五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5 月 27 日，版 8。

⁵⁶ 〈臺北市公會堂 單獨建設か 商工館が中止となつた場合〉，《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7 月 17 日，版 7。

後之公會堂建設埋下一再延宕之伏筆。⁵⁷ 營繕課井手薰與栗山俊一認為，總督府舊廳舍乃日本治臺始政儀式與歷任總督和民政長官辦公所在，深具歷史意義，故應保存。⁵⁸ 同時，曾在明治 32 年（1899）任後藤新平（1857-1929）長官參事官長的石塚英藏總督，在勘查舊廳舍時「回想三十年前舊事」，對該空間如數家珍，深具歷史情感，最終也做出「若得稍加變更保存，則以保存為宜」之決策。⁵⁹ 由此觀之，縱使面臨市區改正政策下之拆除規劃，但卻由於總督與總督府官員對舊廳舍一地空間的個人記憶與歷史意義之認知，使舊廳舍暫免拆除，甚至在昭和 5 年（1930）仍進行多項修繕工事，以利建物之維護。⁶⁰

雖然公會堂興建地點仍然難產，增田秀吉市尹於昭和 4 年（1929）9 月起仍為臺北公會堂建設編列 3 年至少 90 萬預算，並具體編列昭和 5 年（1930）年度預算 20 萬。⁶¹ 然由於在城內地區找不到適當建地，且總督府主張保留舊廳舍，臺北市役所只能繼續與總督府交涉，期以該地作為公會堂建地。於是，昭和 4 年（1929）12 月 15 日，臺北市 14 個町代表集會，決議促請總督府收回保存舊廳舍成命，以之作為公會堂建地。⁶² 然而，到昭和 5 年（1930）1 月 17 日，總督府仍堅持保留舊廳舍，並計畫以文武町總督官邸斜對角、度量衡

⁵⁷ 〈榮町督府舊廳舍 即前清時代撫臺衙 有保存記念消息 附總督市內巡視談〉，《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0 月 16 日，版 n04。

⁵⁸ 井手薰，〈總督府舊廳舍の保存に就て〉，《臺灣時報》133（1930 年 12 月），頁 51-55；栗山俊一，〈臺灣總督府舊廳舍の保存〉，《臺灣建築會誌》2：5（1930 年 9 月），頁 1-3。

⁵⁹ 〈榮町督府舊廳舍 即前清時代撫臺衙 有保存記念消息 附總督市內巡視談〉。

⁶⁰ 1930 年間，總督府會計課曾進行總督府舊廳舍諸如蟻害等修繕工事，參閱：〈總督府舊廳舍蟻害修繕工事假領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277 冊第 39 號；〈工事請負入札（會計課）〉，《臺灣總督府報》第 1024 號，1930 年 8 月 3 日，頁 7；〈總督府舊廳舍附屬煉瓦塀新設其他工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359 冊第 39 號；〈總督府舊廳舍一部間仕切補修其他修繕工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359 冊第 61 號；〈總督府舊廳舍建具取付工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359 冊第 62 號；〈總督府舊廳舍附屬便所修繕工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359 冊第 69 號。

⁶¹ 臺北市役所，《臺北市報》第 188 號，1930 年 9 月 1 日，頁 66；〈市新規事業中のピカ一 懸案「臺北市公會堂」 九十萬圓三箇年繼續事業として 増田市尹が腕試し〉，《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0 月 26 日，版 7。

⁶² 〈舊廳舍跡に 公會堂 建設を申合す〉，《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12 月 16 日，版 5。

所後方的財務局長官舍一角作為公會堂建地，且由總督府無償提供。⁶³

然而，在此一階段，臺人開始表達反對臺北公會堂建設。昭和 5 年（1930）1 月 9 日，臺灣民眾黨臺北支部召開執行委員會，包括蔣渭水在內的 16 個委員，決議反對興建公會堂，其理由為：「總經費九十萬圓，市民每人要負擔四圓左右」，考慮當時環境之「不景氣和緊縮」，實在「甚不經濟」。況且，臺北尚有大稻埕公園和下水溝、道路等建設需求，「至今尚置之度外」，反而要「將沒有迫切緊要的公會堂，要投這巨款去建築呢？」⁶⁴ 就此，臺灣民眾黨的反對理由非常實際，卻不乏基於族群利益之考量。臺人一方面稱在「不景氣」與「緊縮」情況下，以巨款興建臺北公會堂非常「不經濟」，另一方面又稱「最重要之大稻埕公園的建設和下水溝、道路等的建築，至今尚置之度外」。因為臺北市役所不但堅持在城內興建公會堂，又同時將大稻埕建設「置之度外」，難怪引起臺人不滿與反對，甚至直言「在此景氣異常不況」且「一般人民的生活尚且不能安飽之時」，市役所堅決興建「窮奢極侈的大建築物」，乃「無謀」之舉，並批評市役所「惟亟亟於建築摩登式的公會堂，用偌大的巨款做不必需的用途」，反而不注意「教室不夠用」、「交通道路的惡壞」、與「失業者的救濟」等問題之解決。對臺人而言，公會堂建設只突顯「當局者的誇耀心和摩登慾」，對於「多數窮困的市民絲毫都沒有益處」。⁶⁵

綜上所述，至此臺人認知與官方市政現代化建設之間的鴻溝，以及雙方對於公會堂建設的意義認知差異，實在既深且廣，在倡議公會堂建設過程中，具體呈現了自 1920 年代中期以來即見諸臺人基於捍衛族群利益的不滿情緒與族群差異政治之雙重作用。

⁶³ 〈臺北市公會堂 敷地略決定 總督官邸正門の筋向ひ 財務局長官舎の一角〉，《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 月 18 日，版 9。

⁶⁴ 〈民黨臺北支部反對建公會堂 進行具體的運動〉，《臺灣民報》，1930 年 1 月 18 日，版 2；此外，臺灣民眾黨甚至期待透過散發傳單以「喚醒輿論」，可惜事前傳單已遭到禁止，參閱：〈反對建築公會堂民黨傳單被禁〉，《臺灣民報》，1930 年 1 月 29 日，版 6。

⁶⁵ 〈民生凋敝中建美奐的公會堂 建築費八十萬圓〉，《臺灣新民報》，1931 年 4 月 25 日，版 2。

(三) 總督府舊廳舍之保留、拆除或拆遷

雖然臺北市役所於昭和 2 年(1927)即已將興建公會堂列為市政建設計畫之一，但其進展並不順利，尤其建地問題始終懸而未決。原本總督府於昭和 5 年(1930)1 月提議由其無償提供文武町總督官邸前財務局長官舍一角作為公會堂建地，但它卻是市區改正公園預定地，且由於年度財政困難，總督府無法進行該地官舍拆除工作。於是，公會堂興築再度「陷於一頓挫」。⁶⁶

此一頓挫，促使公會堂建設派人士開始進行遊說。昭和 6 年(1931)7 月 16 日，臺北市 13 個町代表集會，希望將公會堂建地改為總督府舊廳舍位置，因文武町地點交通不便，且舊廳舍維持經費巨大，在「交通上又多障礙」，不如將之拆除建公會堂。臺北市協議會對此聲明表示支持，並於 18 日議決公會堂應建於原始設定之總督府舊廳舍原址。⁶⁷

事態發展至此，當時公會堂興建地點爭議輿論，主要可歸納為兩派。其一，拆除總督府舊廳舍建公會堂者，除了 14 個町代表與臺北市協議員等拆除派人士，臺北州知事與臺北市尹也持此立場。其二，保存舊廳舍者，如「舊府衙保存期成同盟會」成員，主張總督府舊廳舍乃明治天皇一代鴻業之「永久記念」，更是始政儀式與歷任總督辦公所在，極具歷史意義。⁶⁸ 如前所揭，總督府及營繕課井手薰也持同樣立場。總此，公會堂建地陷入僵局，加上建築經費仍短缺 20 萬，雖向總督府申請「起債二十萬圓」，也仍待解決，⁶⁹ 公會堂建設如入五里霧中。

⁶⁶ 〈公會堂問題之解決 總督府一邊似已決定 二十萬圓起債許可 敷地仍屬舊廳舍跡乎〉，《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8 月 11 日，版 n04；〈臺北市公會堂問題 敷地變更舊廳舍 市議員會集決議 選委員陳情知事〉，《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7 月 22 日，版 n04。

⁶⁷ 〈議折毀督府舊廳舍 建設市公會堂 四城門移轉他處 十三團體長建議〉，《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7 月 18 日，版 8。

⁶⁸ 〈舊府衙保存同盟會員 訪問市尹交換意見 釋然諒解且出援助〉，《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12 月 12 日，版 n04。

⁶⁹ 〈臺北市の公會堂問題 解決の日極めて近し 起債、敷地共に審査を終つて 書類近く長官に廻付〉，《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8 月 12 日，版 7。

陷入僵局近半載，昭和 6 年（1931）底突有轉機。12 月 5 日，臺北協議會員拜訪第五任市尹內海忠司（昭和 6 年〔1931〕5 月 16 日至昭和 7 年〔1932〕3 月 15 日），並於當日召集協議會員與町代表集會，期許「猛烈運動提供舊廳舍，俾早得建設」，並重申公會堂建地以「舊廳舍跡最為適當」。⁷⁰ 同月 7 日，14 町代表再開例會，形成「臺北市公會堂其位置定在舊廳舍跡，冀望至急著手」之決議，並發表聲明，強調公會堂建設乃「御大典記念事業」，但建地遲未能決，實屬遺憾。聲明書重申「前以舊廳舍跡為敷地，信為適當」之決心，並期待「當局善處，期本問題急速解決也」。⁷¹ 10 日，內海忠司市尹與「舊府衙保存期成同盟會」成員協商，期於公會堂中建「總督公室相髣髴之紀念堂」，或建紀念碑，獲得對方「釋然諒解」，並表示「反對者一邊今後亦不反對，且言欲出為援助。」⁷² 16 日，臺北市協議會再討論公會堂問題，決議確定變更公會堂建地為總督府舊廳舍。⁷³ 17 日，臺北市役所經臺北州知事平山泰，向總督府申請將舊廳舍由總督府移轉至臺北州知事轄下，以便拆除後興建公會堂。24 日，總督府認可申請。28 日，臺北市役所收到「無償下付」指令，公會堂建地問題終於解決。⁷⁴ 最後，昭和 7 年（1932）年 3 月 1 日，總督府終

⁷⁰ 〈市議員團體借市尹公室 議公會堂敷地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12 月 6 日，版 8；〈公會堂敷地問題で 猛運動開始の申合せ けふ市協議會員、團體長が 市尹公室に參集して〉，《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12 月 6 日，版 2；〈公會堂建設問題で 市協議會員の決議 舊廳舍跡が敷地として 最も適當、その解決を期す〉，《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12 月 6 日，版 7。

⁷¹ 聲明書內容可參閱：〈台北市公會堂敷地ニ關スル願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278 冊第 46 號；〈十四團體長 發聲明書／決議〉，《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12 月 9 日，版 n04。

⁷² 〈舊府衙保存同盟會員 訪問市尹交換意見 釋然諒解且出援助〉。

⁷³ 〈台北市公會堂敷地ニ關スル願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278 冊第 46 號；〈台北市公會堂建築 決定在舊總督府蹟 於臨時市協議會通過〉，《臺灣新民報》，1931 年 12 月 19 日，版 5。

⁷⁴ 〈台北市公會堂敷地ニ關スル願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278 冊第 46 號；〈官有地使用願書取下ノ件（台北市公會堂關係）〉，《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278 冊第 24 號；〈總督府舊廳舍官用廢止地方廳へ引繼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1278 冊第 45 號；〈台北市公會堂敷地 舊府衙決無償下付 廿四日得總督裁決〉，《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12 月 26 日，版 n04；〈舊府衙無償下付 公會堂從速興工 多年懸案至是解決〉，《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12 月 30 日，版 n04。

批准臺北市役所「起債二十萬圓」申請，認可書於 4 月初送達臺北州廳。⁷⁵ 至此，懸宕多年的公會堂建設問題終獲解決，而臺北市役所也為昭和 7 年（1932）與昭和 8 年（1933）分別編列了 25 萬圓與 38 萬圓營繕費預算。⁷⁶

（四）公會堂之誕生及其所涉記憶、族群與文物保存因素

公會堂建設多年懸案獲得解決，但在動工前，總督府舊廳舍建物的處置方式猶待處理。昭和 7 年（1932）6 月，臺北州廳、臺北市役所、總督府會議正式決定以拆遷方式處理，並提議動物園、新公園、新廳舍附近或文武町官舍等地點。期間，井手薰主張將舊廳舍大門、二門、正殿等建物拆遷至新公園兒玉將軍銅像前，但因該空間狹小實在不適，臺北市役所堅決反對。⁷⁷ 6 月 30 日，在官方總評定會議當中，井手薰力主將舊廳舍主建築遷建至植物園，並獲得通過。⁷⁸ 8 月 17 日，官方正式決定遷建圓山動物園與植物園，並由總督府編列支出預算 2,999 圓著手處理。⁷⁹ 隨即，在 10 月 3 日總督府舊廳舍的移築祭，以及 10 月 4 日分別在舊廳舍、植物園與動物園的地鎮祭之後，開始遷建作業。過程中，因植物園腹地不足，舊廳舍第三進東大堂改遷入淨土宗臺北別院，後作為落成於昭和 10 年（1935）3 月 10 日之忠魂堂改築之用，⁸⁰ 而舊廳舍的頭

⁷⁵ 〈臺北公會堂 問題經過 對長官報告〉，《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2 月 28 日，版 n04；〈臺北市公會堂 廿萬圓起債認可 督府發認可指令〉，《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3 月 2 日，版 8；〈舊府衙近將折去 公會堂建設費之起債 認可書到臺北州〉，《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4 月 10 日，版 n04。

⁷⁶ 臺北市役所，《臺北市報》號外，1932 年 4 月 8 日，頁 3；臺北市役所，《臺北市報》第 314 號，1933 年 4 月 2 日，頁 40。

⁷⁷ 〈取壊しの悲運を免かれ 舊廳舍は移轉改築か 現廳舍と列べて——新公園への移轉にば市が反對〉，《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6 月 15 日，版 7。

⁷⁸ 〈圓山動物園内に 舊廳舍移築 三十日の大評定で 結局元通りと内定〉，《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7 月 1 日，版 7。

⁷⁹ 〈舊廳舍の移築 長官が決裁〉，《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8 月 19 日，版 7；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 第 68 冊》，（臺北：成文，1985），頁 136。

⁸⁰ 〈督府舊廳舍移築祭〉，《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9 月 27 日，版 n04；〈由緒ある舊廳舍の移築祭けふ執行 植物園動物園でわ地鎮祭〉，《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0 月 4 日，版 2；〈由緒深い圓山の忠魂堂移轉落成式 来る十日盛大舉行する 臺北の名所とならう〉，《臺灣日日新報》，

門、儀門、中大堂等中央建築則遷移至植物園草坪區，第二進東翼建築遷移至植物園溫室區，花園遷至植物園小河北段西岸。⁸¹ 截至昭和 8 年（1933）1 月 21 日，舊廳舍移轉工事完成，公會堂建設指日可待。⁸²

昭和 7 年（1932）10 月初，總督府舊廳舍拆遷工程之際，公會堂建設步入開工程序。同年 11 月 23 日，舉行公會堂起工式。⁸³ 隨即，公會堂建築於 12 月 15 日正式動工，並於昭和 10 年（1935）6 月 13 日上午八時舉行上棟式，⁸⁴ 最後於昭和 11 年（1936）12 月 15 日竣工。期間，公會堂建設並不順利。其一，由於建築規模從容納 1,500 名變更為 2,000 名，過程中甚至一度達到 2,500 名，總坪數從 2,200 坪增加到 3,180 餘坪，總工程費卻未大幅調整，動工後自然不足，終需追加 28 萬營繕費與 4 萬冷氣與升降機設備預算，於是臺北市役所於昭和 10 年（1935）又追加 32 萬圓預算解決相關經費問題。⁸⁵ 其二，為舉辦「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建設被迫中斷，之後為完成建築內外部裝飾作業，需日夜趕工。⁸⁶ 最後，公會堂在昭和 11 年（1936）底完工，臺北市役所也於 12 月 26 日通過《臺北市公會堂使用條例》與《臺北市公會堂使用條例施行細則》，⁸⁷ 並於同日舉行落成儀式。

1935 年 3 月 8 日，版 11。

⁸¹ 李瑞宗，《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臺的新透視》，頁 164。

⁸² 〈舊府衙解體移轉分置植物動物兩園 大體工事告成〉，《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4 月 15 日，版 n04。

⁸³ 〈臺北市公會堂起工式 軍司令官長官知事市尹等 文武官民三百餘列席〉，《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1 月 24 日，版 n04。

⁸⁴ 〈臺北市公會堂 十三日舉上棟式 重要官民臨場述祝〉，《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6 月 14 日，版 n04。

⁸⁵ 〈來秋竣成する 市廳舎と公會堂 三線道路公質横に出来る 近代式の壯麗な建物〉，《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5 月 21 日，版 3；〈臺北市公會堂圖案已成 食堂可容二千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4 月 1 日，版 4；〈臺北公會堂大客廳 一部重設計改換 可收容二千餘名〉，《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0 月 5 日，版 8；〈公會堂設計 應必要漸次擴大 工費不足廿八萬圓 十年度可完全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1 月 23 日，版 8。

⁸⁶ 〈臺北市公會堂 八月中板塼折去 充為博覽會會場〉，《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1 月 31 日，版 n04；〈臺北公會堂工事 半充臺博土木交通館 集會堂裝飾兼作夜業〉，《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7 月 16 日，版 n04。

⁸⁷ 臺北市役所，《臺北市報》第 525 號，1936 年 12 月 29 日，頁 139-142。

臺北公會堂興建一波三折之歷程，除了可見其空間意義之生產過程，也可見其所涉記憶與族群因素。首先，昭和 4 年（1929）10 月，原本因市區改正行將拆除的舊廳舍，在石塚英藏總督與井手薰等人堅持下獲得保留，而其理據便是該地曾為始政儀式與日治初期總督府廳舍，深具歷史與象徵意義。石塚英藏總督巡視舊廳舍時，也憶起 30 年前任參事官長舊事，最後作出「保存為宜」決策，可見個人情感與記憶之影響。

其次，總督府舊廳舍拆除或保留爭議之時，正值「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後稱「保存法」）將於昭和 5 年（1930）正式實施之際，而此或與總督府及民間人士的保存主張不無關係。日本帝國議會在大正 8 年（1919）4 月通過「保存法」，而在臺灣正式實施前，臺灣博物學會已具體倡議推動。⁸⁸ 尤其，在素木得一（1882-1970）首次擔任會長期間，於大正 12 年（1923）提出「臺灣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建議案」，而總督府舊廳舍便是建議保存項目之一。⁸⁹ 昭和 4 年（1929），總督府編列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所需經費。昭和 5 年（1930）3 月 5 日，總督府正式公布「保存法」，並於同年 12 月成立「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調查會」，而素木得一與主張保留總督府舊廳舍的井手薰則名列調查委員。⁹⁰ 而且，昭和 5 年（1930）總督府內務局出版《本島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概況》一書，也收入上述臺灣博物學會所提名單。⁹¹ 無獨有偶，在昭和 4 年（1929）與昭和 5 年（1930）間，正當各界爭執是否拆除舊廳舍時，「舊府衙保存期成同盟會」也主張保存總督府舊廳舍。雖目前尚無資料

⁸⁸ 關於 1910 年臺灣博物學會之成立及其組織，參閱：范燕秋，〈日治初期的臺灣博物學會——日本博物學家與臺灣自然史的建構〉，《師大臺灣史學報》5（2012 年 12 月），頁 3-39；關於臺灣博物學會推動「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事蹟，參閱：歐素瑛，〈素木得一與臺灣昆蟲學的奠基〉，《國史館學術集刊》14（2007 年 12 月），頁 166-167。

⁸⁹ 〈臺灣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に對する建議案〉，《臺灣博物學會會報》68（1924 年 1 月），頁 41-42；〈臺灣に於ける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の廢滅及び變形せんとする主なるもの、調査〉，《臺灣博物學會會報》68（1924 年 1 月），頁 42-43。

⁹⁰ 〈行政諸法臺灣施行令中改正〉，《臺灣總督府報》第 902 號，1930 年 3 月 5 日，頁 17；歐素瑛，〈素木得一與臺灣昆蟲學的奠基〉，頁 167。

⁹¹ 臺灣總督府，《本島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概況》（臺北：總督府內務局，1930），頁 87-106。

可以確定「舊府衙保存期成同盟會」成員及其與臺灣博物學會的關係，但以當時官民推動史蹟保存的時代脈絡為考量，有其合理性。

第三，公會堂建設過程清楚呈現官民對公會堂空間及其建設之不同認知。由上述可見，公會堂倡議興建過程中，屢遭臺灣民眾黨等臺人社群反對。除了因經濟不景氣因素而反對以巨款興建公會堂之外，臺人尤在在表達對興建位置的關切。在當時臺北三市街區內臺人與內地人社會空間族群差異政治之下，市政當局在建設資源分配上偏好內地人口較多的城內地區。臺人為了族群與地區利益，主張依人口比例原則選擇公會堂建地，反映其於族群差異之焦慮，益使其產生對於公會堂興建及其一地空間意義之認知，不同於官方論述。臺灣民眾黨即曾直言，興建公會堂乃「無謀之舉」，只表現出當權者的「誇耀心」與「摩登慾」。換言之，日治時期臺北市人口分布與政治展現出族群的區域化差異，而興建在城內地區的公會堂，正好是該差異的物質化與空間化表現。

最後，公會堂建築興建歷程亦可窺探其空間功能和意義在設置初衷與具體使用情況之間的矛盾性。就其興建背景言，除了作為淡水館拆除後日本治臺首都各式集會空間外，臺北市公會堂被設定為裕仁天皇「御大典記念事業」，可謂裕仁天皇登基與國家象徵的物質文化表徵，故得列臺北市政建設項目。就其原初公會堂空間設計的功能與意義言，臺北市役所發表設計藍圖時，將公會堂空間設定為「新年交禮會、始政紀念祝賀會、大講演會、大演藝會等其他大小宴會與展覽會」等儀式性、展示性、集會性活動場所，在井手薰的報告書中亦指出公會堂中設有平日開放給一般民眾之娛樂室、一般餐廳與集會活動空間。⁹²然而，在興建過程中，該空間已是官方舉辦具國家象徵與政治意涵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儀式性與展示性場所，成為官方「置入」歷史與政治論述的空間。在興建完成之後，在臺北公會堂落成儀式過程中，第八任市尹石井龍豬（昭和 11 年〔1936〕10 月 16 日至昭和 14 年〔1939〕12 月 27 日）等官

⁹² 〈臺北市公會堂設計 爲近代式四階 邀關係者說明設計〉，《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8 月 21 日，版 n04。

員進行演講，講述上溯至三百年前的日本人在臺發展史，形同在臺北公會堂「置入」官方版本之臺灣史論述，且次而述及日本治臺以來產業經濟之進步，最後展望臺灣成為對南華與南洋航空路基地之「焦眉急務」。⁹³ 此次儀式性活動，臺北市當局不但藉由講述日人在臺歷史宣示其治臺之歷史正當性，更具體呈現小林躋造（1877-1962）在昭和 11 年（1936）9 月就任臺灣總督以來的「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⁹⁴ 政治論述。不僅如此，如下文進一步具體討論所示，緣於臺北公會堂落成於接近戰爭爆發與後續戰時體制時期之特殊時機，諸般深具官方性質的儀式性與展示性活動，將持續使一般市民集會與藝文性活動受到限縮，最終與臺北公會堂建築初步規劃功能有所差異，體現新藤浩伸所揭櫫的日本公會堂空間於設置初衷與實際運用情況之間的矛盾性，也因而奠定其官式功能與意義之基調，且後續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於公會堂所舉辦之紀念性、儀式性、展示性與藝文性活動中不斷進行建構，並體現在其成為國民精神總動員與皇民奉公運動「記憶所繫之處」的空間意義生產之上。⁹⁵

三、戰爭時期臺北公會堂官式空間意義之建構

建成之臺北公會堂乃一造價達 98 萬元的鋼骨鋼筋混凝土四層樓建築，建坪數約 1,237 坪，總建築坪數達 3,185 坪。公會堂內部包括位於東側可容納 2,056 席位的兩階式四層樓集會室，以及西側二、三層樓可容納 1,100 座席與 2,000 立席之大食堂，還有中集會室一間、小集會室兩間、中型日本間一間、小型日本間兩間等集會空間。此外，除了一般食堂、娛樂室、理髮室、來賓室、大廣間兼休憩室與舞臺控制室，還裝置了換氣、防火、給水、衛生、電力升降、電

⁹³ 〈臺北市新公會堂 廿六日舉落成式 元旦交禮會初次使用〉，《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12 月 17 日，版 12；〈臺北市大公會堂式後 記念講演會 多數聽衆大感動〉，《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12 月 28 日，版 8。

⁹⁴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臺北：前衛出版社，2013），頁 174。

⁹⁵ 再如，1938 年 6 月 17 日，總督府即在公會堂舉辦第 43 回始政記念日祝賀會。參閱：臺北市役所，《臺北市報》第 630 號，1938 年 6 月 23 日，頁 135。

話、電鈴、電氣鐘、避雷針、瓦斯設備等現代化設備。⁹⁶ 如此，臺北公會堂的建築規模與容納人數得以僅次於日本的東京、大阪與名古屋公會堂。⁹⁷ 相較於大正 7 年（1918）以 100 萬預算竣工的大阪中央公會堂、⁹⁸ 昭和 4 年（1929）以 300 萬預算竣工的東京日比谷公會堂，⁹⁹ 以及於昭和 5 年（1930）以總工費 204 萬竣工的名古屋公會堂，¹⁰⁰ 資源較為缺乏的臺北市役所，能以 98 萬經費完成規模可堪匹敵的臺北公會堂，實屬不易，故井手薰在臺北公會堂落成報告中便感嘆，將近 20 年前完工的大阪中央公會堂已經花費 100 萬預算，而在昭和 11 年（1936）若要在日本興建像臺北公會堂這種規模的建築，一般也要準備 200 多萬的預算。¹⁰¹

臺北公會堂外觀反映時代變遷，並兼容日臺建築元素。首先，公會堂由大小不等幾何方塊層層堆疊組成，呈現階梯狀的量體層次感。其次，建築立面外層以各色磁磚拼貼排列，呈現各種幾何紋飾。其中一樓外牆以中村式花崗石黃色人造石板與洗石子鋪陳，突顯臺基之穩重，而二樓以上則以橫向五疊淺綠褐色磁磚為單位，單位間又鋪以深色細長圓弧形溝縫磚，以增添建築立面的層次感。¹⁰² 而磁磚拼貼之運用，尤反映當時日本內地建築之影響。例如，公會堂建築立面的「壁毯面磚」（Tapestry Tile）與「陶瓦面磚」（Terra Cotta Tile），表現出日本建築外牆磁磚在關東大震災後約昭和 7 年（1932）前後至昭和 15 年（1940）

⁹⁶ 不著撰人，《臺北市公會堂建築工事概要》，頁 3-8；井手薰，〈臺北市公會堂落成式に於ける工事報告〉，頁 250-252。

⁹⁷ 井手薰，〈臺北市公會堂落成式に於ける工事報告〉，頁 250；曾筱甯，〈眾樂之堂：臺北中山堂（公會堂）藝文展演研究〉，頁 52。

⁹⁸ 井手薰，〈臺北市公會堂落成式に於ける工事報告〉，頁 252。

⁹⁹ 不著撰人，〈市政會館及日比谷公會堂建築工事概要〉，《都市問題》10：1（1930 年 1 月），頁 233。

¹⁰⁰ 新藤浩伸，《公会堂と民衆の近代》（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4），頁 92。井手薰在其臺北公會堂建築報告中，指稱名古屋公會堂花費了 220 萬工費，參閱：井手薰，〈臺北市公會堂落成式に於ける工事報告〉，頁 252。

¹⁰¹ 井手薰，〈臺北市公會堂落成式に於ける工事報告〉，頁 252-253。

¹⁰² 溫祝聆，〈空間元素的並列到調和〉，頁 92、95-96。

期間所謂「國防色」磁磚的發展特色。¹⁰³ 第三，公會堂建築亦融入臺灣在地特色，例如公會堂的立面與正面二樓外露臺邊緣，均覆以閩南建築橘紅色丸瓦收邊，外窗則為日式格狀窗菱變型造型，創造竹節印象，頗具新意。¹⁰⁴

此外，公會堂建築體正面之大型立方體車寄（門廊），而車寄頂上所形成之大露台，亦可作政治領袖演講與檢閱群眾舞台。¹⁰⁵ 此一建築設計，為戰後蔣介石在中山堂露臺參加臺灣光復節週年紀念大會，提供了物質與空間基礎。

臺北公會堂落成後，該地空間雖不再如總督府舊廳舍時期扮演著政治中心的功能，但仍是日本帝國治臺首都展示國家機器權力的官式空間。在落成之前，它已成為總督府於昭和 10 年（1935）10 月 10 日至 11 月 28 日舉行「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的第一會場，以及開幕與閉幕儀式活動的場地，¹⁰⁶ 以展示日本帝國「在臺灣四十年的統治是殖民史未嘗見過的成功」，¹⁰⁷ 而此一空間在總督府舊廳舍時期，便已是「始政三十年紀念展覽會」展示臺灣「日本治理時期的成功與偉大」的「記憶所繫之處」。然而，緣於其完工與落成的特別時機，正式啟用之後的臺北公會堂，其官式空間意義更為突出，以下具體討論之。

（一）臺北公會堂的時代特性

臺北公會堂原初規劃之興建動機與目的，可謂日本公會堂建設在臺之延伸。日本公會堂建設乃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為步入現代化國家之林，而學習西方國家進行公民社會建構、公民教育、公民素養形塑與國家認同建構等國家

¹⁰³ 崛込憲二，〈日治時期臺灣近代建築外牆磁磚形式與色彩變遷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8（2011 年 12 月），頁 19-48；關於「壁毯面磚」與「陶瓦面磚」之詳細說明參閱前揭文頁 31 與 33。

¹⁰⁴ 溫祝羚，〈空間元素的並列到調和〉，頁 95。

¹⁰⁵ 溫祝羚，〈空間元素的並列到調和〉，頁 93。

¹⁰⁶ 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誌》，頁 4、9、67、533-549、619-629。

¹⁰⁷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臺北：群學，2010），頁 266；關於「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之論著可參閱：程佳惠，《台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 年魅力台灣 SHOW》（臺北：遠流，2004）；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2005），頁 195-291。

建設工程的一部分，但誕生於戰爭前夕的臺北公會堂，由於其興建與落成使用的時代特性，其作為展示日本帝國意識形態與政治論述的官式空間意義，更為突出。¹⁰⁸

日本公會堂建設源於明治時期，蓬勃發展於大正時期，並於昭和時期達於高峰。其作為公共空間之使用而言，大體以政治集會與演說、政經特權階級俱樂部活動、產業物產陳列展覽、國民與國家紀念日儀式與政治宣傳動員運動，以及公民教育和文藝娛樂活動為主。¹⁰⁹ 就公會堂的興建動機而言，公會堂首先是現代化城市之象徵，不但是因應公民社會市民集會需求不可或缺的設施，更是培養城市公民自治教育與文藝、戲劇、音樂、美術、演講等娛樂文教活動的舞臺，或工商產業從事集會、演講與展覽的場所，也是改善社會風俗道德的必要公共空間，是故市政當局多倡議興建，如東京日比谷公會堂。¹¹⁰ 其次，部分公會堂如名古屋與大阪公會堂，則緣於地方卓有成就之政經人士捐建而成，以作為教化民眾設施之公共空間。¹¹¹ 再者，部分公會堂則是作為與皇室成員相關之「記念事業」而興建，以紀念諸如天皇巡幸、御大典或皇太子成婚等重要事件。例如，名古屋公會堂便是為紀念裕仁於大正 12 年（1923）的御成婚而建。¹¹² 以臺北公會堂而言，如同在日本的公會堂，除了為服膺現代化城市建設與市民集會活動公共空間需求的動機之外，也以「昭和御大典記念事業」為名義興建。是故，為發揮官式活動機能，四個公會堂均特意強調大型集會或展覽場所的設計，都規劃了大集會廳與大宴會廳等兩大中心空間。¹¹³

¹⁰⁸ 關於日本公會堂之緣起與發展相關討論，可參閱：新藤浩伸，《公会堂と民衆の近代》；曾筱甯，〈眾樂之堂：臺北中山堂（公會堂）藝文展演研究〉，頁 9-11；柯勝釗，〈日治時期台南社會活動之研究——以台南公會堂為例〉，頁 115-120；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所設立之第一座公會堂，可參閱：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頁 178-180；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公會堂之研究——兼論基隆地方社會的發展〉，頁 75-106。

¹⁰⁹ 新藤浩伸，《公会堂と民衆の近代》，頁 34-50、271-281、281-282、295-302、334-352。

¹¹⁰ 新藤浩伸，《公会堂と民衆の近代》，頁 65-67；關於此可參閱所引新藤浩伸著作頁 65 表格。

¹¹¹ 新藤浩伸，《公会堂と民衆の近代》，頁 70-71、73；關於此可參閱所引新藤浩伸著作頁 71 表格。

¹¹² 新藤浩伸，《公会堂と民衆の近代》，頁 83-84；關於此可參閱所引新藤浩伸著作頁 84 表格。

¹¹³ 溫祝羚，〈空間元素的並列到調和〉，頁 111-125。

雖日本公會堂原初規劃功能多元，但進入戰爭時期，其作為國家機器進行國民與國家紀念日儀式，或政治宣傳動員運動之官式空間意義，尤為突顯，因此其原本兼具市民集會活動場所的空間意義，「在軍國主義掛帥的政權下」儼然成為「教化訓練所」¹¹⁴，如此呈現公會堂設置初衷與實際運用情況之間的矛盾性，甚而藝文性活動也充滿政治意涵。¹¹⁵ 是故，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皇室紀念活動如「紀元兩千六百年奉祝」、陸軍與海軍紀念日或慰靈祭、支那事變紀念日、國民精神總動員與皇民奉公運動等，成為日本公會堂較突出的空間功能。¹¹⁶

同樣地，正式啟用於昭和 12 年（1937）的臺北公會堂，在戰爭爆發之後，迅速成為日本帝國藉各種紀念性、儀式性、展覽性與藝文性集會活動，在臺從事國民精神總動員與皇民奉公運動之場所。¹¹⁷ 因此，原本亦可作為市民公共活動空間的臺北公會堂，在戰時更像日本帝國國家機器的「監控裝置」，¹¹⁸ 相較於臺灣其他較早興建使用之各地公會堂在進入戰爭時期之前所展現出的非官方市民集會和藝文性活動之空間功能與意義，其官式色彩更為濃厚。是故，本節便進一步爬梳與歸納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各式紀念性、儀式性、展覽性與藝文性集會活動，以論證並突顯其官式空間意義之建構歷程。

為使本節討論更為聚焦，不流於單純分類與整理，本文將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官式空間意義之建構，定義為官方社群透過各種形式之社會實踐複製主流論述，以賦予特定空間特定意義與社群意涵的歷程。亦即，在賦予空間特定意義的過程中，官方經由「佔據」與「使用」特定空間，透過紀念性、儀式性、展覽性與藝文性等形式之社會實踐，「置入」主流歷史詮釋或政治論述，並賦

¹¹⁴ 曾筱甯，〈眾樂之堂：臺北中山堂（公會堂）藝文展演研究〉，頁 60。

¹¹⁵ 新藤浩伸，〈公會堂と民衆の近代〉，頁 394、424。

¹¹⁶ 新藤浩伸，〈公會堂と民衆の近代〉，頁 334-352。

¹¹⁷ 新藤浩伸在其日本公會堂研究中，也特別述及戰爭時期臺灣公會堂各種國民與紀念日儀式與政治宣傳動員活動，參閱：新藤浩伸，〈公會堂と民衆の近代〉，頁 363-364。

¹¹⁸ 夏鑄九，〈公會堂與大稻埕南街——殖民城市的中心廣場與反殖民城市的對抗性都市空間狹縫〉，收於人間副刊主編，〈回到中山堂〉，頁 156-157。

予該空間社群意涵，如此構成社群集體或國族認同建構的基礎。¹¹⁹ 尤其，在此一空間意義建構過程中，其主要關鍵，在於透過主流歷史詮釋與政治論述，將集體共享之歷史經驗、記憶或「歷史感」，「安置」於空間之中，作為構成社群集體或國族認同的基礎。¹²⁰ 就此而言，提爾（Karen Till）也指出，社會記憶建構之過程，即是「社會群體相互競逐以取得再現其所詮釋之過去版本的權威性，以合法化其政治目的與認同的動態歷程」。¹²¹ 換言之，官方在特定空間中利用各種社會實踐形式來達成「再現其所詮釋之過去版本」的目的，從中彰顯並壟斷集體歷史之詮釋權，再以之作為集體或國族認同建構之途徑。¹²² 然而，最要者，如此並不意味官式空間意義之主宰性與全面性影響，由於社群性差異的對抗性、另類歷史論述與空間意義之認知，仍有其存在的可能性。故而，一地空間意義之建構緣於社群差異的多元性，也誠屬自然之理。本文以下即援用此一空間意義之社群性建構及其多元性的分析視角，具體檢視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官式空間意義的建構歷程。

（二）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官式與另類空間意義認知

臺北公會堂在落成之前，已成為「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之後簡稱始政博覽會）的儀式與展示場所，並成為總督府「置入」官方歷史與政治論述的空間。就宣傳日本在臺殖民歷史與成就之意義言，在始政博覽會之前，總督府即曾在大正 14 年（1925）於舊廳舍舉辦「始政三十年紀念展覽會」（之後簡稱展覽會），但在空間意義上，兩者之間仍有所差別。其一，展覽會第三會場地點，仍在座落於前清建物的總督府舊廳舍建築之內，而始政博覽會則是

¹¹⁹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4), pp.27-38；例如臺北新公園之於同性戀社群的認同建構，參閱：王志弘，〈台北新公園的情慾地理學：空間再現與男同性戀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1996年4月），頁195-218。

¹²⁰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pp. 81-85.

¹²¹ Karen Till, "Places of Memory," in J. Agnew, K. Mitchell, G. Ó Tuathail, ed.,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2003), p.289.

¹²² Karen Till, "Places of Memory," pp. 289-290.

在日治時期完全新建的公會堂之內。其二，展覽會的開幕儀式並非設於總督府舊廳舍，而是在作為第二會場的植物園演武館，總督府舊廳舍僅是第三會場「交通館」的場地，但公會堂不僅是始政博覽會第一會場場館，更是舉行開幕式與閉幕式的「儀式大會場」。¹²³ 再考慮總督府在博覽會經費籌措、人事安排、場地選擇與主題設定之支配作用，其官式意義則更為明顯。¹²⁴

不僅如此，在始政博覽會開幕與閉幕儀式中，總督府藉由演講活動之進行，將官方版本的臺灣史論述「置入」公會堂空間之內，並透過各種活動展示日本帝國「南進政策」等政治論述。例如，在開幕儀式中，總督府總務長官平塚廣義（1875-1948）即以博覽會會長身份，在祝辭中簡述日本治臺 40 年史，描繪臺灣如何經「四十年官民一致不擾不斷之努力」轉變為「產業蔚然」與「教化盛行」之地，而與日治之前恍如「隔世」。如此首先回顧治臺 40 年建設史，再而述及始政博覽會展示日本治績之策展結構與內容，也呈現於臺灣總督中川健藏（1875-1944）的告辭，以及內閣總理大臣岡田啟介（1868-1952）等官民代表之祝辭中。¹²⁵ 這樣的儀式性展演，一方面在公會堂「置入」日治臺灣 40 年的官方史論，強化日治之歷史正當性，另一方面在在突顯日本在臺殖民事業於全球帝國主義時代脈絡下的典範意義。經如此宣示，總督府將「再現其所詮釋之過去版本」植入於臺北公會堂空間，以此為建構臺灣島民對日治之政治認同與對日本之國族認同的基礎。

其次，始政博覽會也意在透過展示臺灣政治、產業與教育方面之進步，將臺灣形塑為向華南和南洋殖民的南進基地範本，企圖以此吸引內地與國外資本。¹²⁶ 此一「南進政策」主流論述，即具體呈現在始政博覽會舉辦旨趣說明之中。例如，平塚廣義的《趣意書》明白稱臺灣乃日本帝國往「南支（華南）

¹²³ 不著撰人，〈始政三十年記念展覽會交通館記〉，《臺灣遞信協會雜誌》68（1925），頁 4、6；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頁 71。

¹²⁴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 245-246。

¹²⁵ 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535-541。

¹²⁶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 245-246。

與南洋」發展之「策源地」，而同樣論述，也呈現在其閉會式辭中。¹²⁷ 如此，作為始政博覽會「儀式大會場」，臺北公會堂不但被「置入」日本治臺歷史之官方版本，也成為「南進政策」政治論述的展示空間。

有趣的是，在始政博覽會期間，臺北市宛如「一大會場」，¹²⁸ 也具體化了前文所述之三市街權力和資源分配的社群差異政治。在籌備期間，第一、第二會場原規畫於城內公會堂至小南北三線道路區間與臺北公園，即呈現了日治時期重內地人人口比例高之城內地區，而輕臺民居多之大稻埕與艋舺地區之趨勢，而此一態勢亦已展現在公會堂興建過程之中。是故，昭和 10 年（1935）1 月 23 日，大稻埕商紳便組成「大稻埕分館期成同盟會」，要求總督府在大稻埕另闢第三會場，而總督府也接受陳情而在大稻埕特設「南方館」。除了大稻埕商人願意負擔部分經費的因素之外，總督府認為「南方館」之設置，不但可與「本島人街景可以渾然融合」，還可「使介紹南洋實情的效果增大」。¹²⁹ 就此而言，呂紹理即認為，此一空間安排有意藉展示大稻埕「純然漢人風味」建築、街道與人群，讓參觀者「宛若置身南洋」，進而對比主會場所在之城內地區所呈現出來的現代化，以突顯日人之進步，以及臺人與日人社區之間的差異。¹³⁰ 換言之，從日治初期到始政博覽會，輕臺人大稻埕、艋舺區域而重日人城內地區之態勢依舊，且屢以空間方式呈現，而其間公會堂也一再成為臺北三市街區權力與資源分配族群差異的指標。

更要者，雖總督府以公會堂舉辦始政博覽會植入官式空間意義，但由當時臺人日記與文藝創作則可窺見另類空間意義認知的差異性存在。關於此，呂紹理在其有關臺人社群面對始政博覽會的四種反應類型分析中已有精彩論述，本文不再贅述，僅從中山堂一隅空間意義認知社群差異與多元性視角，再解讀

¹²⁷ 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頁 2、621。

¹²⁸ 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頁 535。

¹²⁹ 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頁 74。

¹³⁰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 248-249、281。

朱點人（1903-1951）的短篇小說〈秋信〉。¹³¹ 就此而言，呂紹理認為，昭和 11 年（1936）朱點人發表的〈秋信〉，再現了臺人對始政博覽會趨之若鶩與置若罔聞的兩樣情態，¹³² 而本文則要進一步指出，小說中具有前清遺老身份的斗文先生，其所表現出來的置若罔聞態度，正好反映其內心對漢民族文化之認同與懷舊之情，而且此情更在他突然發現前清撫臺衙消失的「興廢之感」中達於高潮。¹³³ 亦即，正由於原前清地景與建築因政權轉移而不復存在，而將自我身份認同依附於撫臺衙的斗文先生，才會頓覺「無限滄桑」之感，再也無法「恢復四十年前的自己」，¹³⁴ 而由此亦可見記憶、空間與認同之間的複雜關係，也足見公共空間意義認知的社群性差異與多元性。

（三）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與打造日本國族認同

臺北公會堂落成不到一年，旋即遇到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內閣會議通過「國民精神總動員計畫實施要綱」，正式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昭和 13 年（1938）3 月 24 日，日本通過國家總動員法，進入戰時體制時期。臺灣總督府於 9 月 10 日通過「實施要綱」，並於 9 月 24 日成立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提振「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不拔」之精神方針。¹³⁵ 爾後，總督府本部與各地支部，除了刊行運動宣傳品，並積極舉辦協議會、演講會、講習會、放映會與教化會，以文藝、音樂與演劇等形式進行政治宣傳，更舉行標語、歌謠與臺灣進行曲選定活動。於是，總督府與地方州廳亦隨即在臺北公會堂舉辦國語講習所大會、教化大會、演講會、與國民精神總動員放映

¹³¹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 282-291。

¹³² 除了呂紹理之論述觀點，相關論述另可見：陳芳明，〈現代性與殖民性的矛盾：論朱點人小說中的兩難困境〉，收於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臺北：麥田，2004），頁 95-114。

¹³³ 朱點人，〈秋信〉，收於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恒豪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頁 237。

¹³⁴ 朱點人，〈秋信〉，頁 232-233、236。

¹³⁵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1938），頁 13-14、22。

會等活動，致力消弭臺人祖國思想，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¹³⁶

在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脈絡下，臺北公會堂迅速成為各種社團從事宣傳官方政治論述的地方。例如，各種產業、社會、政治團體，經常在公會堂舉行歡迎會、祝賀會、紀念會、座談會、演講會、產業會、慰安會、展覽會、放映會、表演會與宗教會等儀式性活動。這些集會雖屬產業性質，但作為總動員運動經濟戰一環，即經常出現臺灣工業化與南進基地化等官方論述，而為戰歿將士慰靈祭也成為儀式性慣例。如此透過各種儀式性活動而將官方論述「置入」臺北公會堂一隅空間的事例不勝枚舉，無法一一細究，以下聚焦於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時期之探究。

在國民總動員運動期間，重要紀念日儀式活動，經常在臺北公會堂舉辦。在中日戰爭之前，如日本內地公會堂，臺北公會堂已是紀元節（2月11日）或建國祭儀式主要會場。戰爭爆發後，紀念日本建國紀元節或建國祭儀式更形重要。昭和13年（1938）2月11日建國祭式典與奉祝武道大會即在臺北公會堂舉行，期間小林躋造總督等主要官員與手持標語官民代表齊聚公會堂，依程序進行國歌演奏、式辭、合唱、呼口號、閉幕式辭、默禱，還在小林躋造總督帶領下三聲高呼「大日本帝國萬歲」。¹³⁷ 甚者，因應戰時需求之儀式變化，也呈現在臺北公會堂活動中。例如，原本在建國祭中並無「愛馬大行進」項目，但為宣傳戰時日本馬政計畫，便在儀式中加入「愛馬大行進」，寄意感激為戰爭犧牲的軍馬，並進行馬的市街遊行、官民代表合唱「愛馬軍軍歌」，以及舉辦「愛馬之會」與「愛馬之夜」等活動。¹³⁸

¹³⁶ 〈臺北市國語講習所大會〉，《臺北市報》第632號，1938年7月1日，頁143；〈臺北市教化大會〉，《臺北市報》第635號，1938年7月21日，頁160；〈全島民・鐵の結束へ 國民精神總動員講演會 福原特派員の事變映畫を公開 ゆうべ臺北市公會堂で〉，《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10月1日，版11；〈國民精神總動員の講演と映畫會〉，《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7月7日，版n02。

¹³⁷ 〈建國祭〉，《臺灣愛國婦人新報》101（1938年3月），頁6；〈建國祭式典其他行事決定〉，《臺北市報》第657號，1939年2月8日，頁19。

¹³⁸ 戴振豐，〈日治時期台灣「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軍馬祭」的形成與進行（1936-1945）〉，《政大史粹》6（2004年6月），頁61-94；〈きのふ「愛馬の會」 臺北市公會堂

利用紀念日活動推進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之作法，也見諸「紀元兩千六百年」奉祝活動。昭和 15 年（1940）是日本紀元兩千六百年，官方藉奉祝系列活動，諸如日本萬國博覽會、六大奉祝記念事業、紀元兩千六百年祝典等，進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日本本土、殖民地與佔領地，紛以奉祝紀元兩千六百年之名，舉辦儀式性活動與建設紀念性建築，最後於 11 月 10 日在東京「宮城」廣場的「紀元兩千六百年式典」，以及次日的「紀元兩千六百年奉祝會」達於高潮。有趣的是，日本政府更明令全國，在舉行奉祝式時，全民應配合收音機轉播與「式典」同步高呼萬歲。臺灣當天也舉行「島都奉祝式典」，並在臺北公會堂舉辦「奉祝之夜」，隨收音機與東京現場一起高呼萬歲，一時之間宛如一國一家同步融合於一個「想像的共同體」。¹³⁹ 換言之，透過類似「紀元兩千六百年」祝典如此儀式性活動，官方政治論述得以重複「置入」臺北公會堂空間，成為在臺打造日本國族認同的基礎。

中日戰爭相關紀念活動，也不斷在臺北公會堂上演。尤其，每年 7 月 1 日，總督府、軍方或民間團體，均在公會堂舉行支那事變或興亞記念日儀式、展覽活動。昭和 13 年（1938），臺灣總督府與臺灣日日新報社在週年紀念當天，舉辦「支那事變」博覽會、興亞記念大會、演講會或戰歿將士慰靈大會。¹⁴⁰ 其他諸如滿洲事變、陸軍記念日、海軍記念日、戰時體制週年記念日，總督府或軍部都會在臺北公會堂舉辦記念式、祝賀會、演講會與放映會。¹⁴¹ 作為戰時社會

で盛大に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4 月 10 日，版 7；〈愛馬の夕べ 今夜公會堂で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4 月 8 日，版 n02。

¹³⁹ 蔡錦堂，〈「紀元兩千六百年」の日本與臺灣〉，《師大臺灣史學報》1（2007 年 12 月），頁 51-88。

¹⁴⁰ 〈事變一周年を迎へ 支那事變博覽會 七月一日より 市公會堂にて／事變博の内容〉，《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6 月 13 日，版 n02；〈支那事變一周年記念の“事變博と防共展” 七月一日より 臺北市公會堂にて 督府・軍部の後援、本社の主催／事變博の内容〉，《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6 月 4 日，版 7；〈興亞記念日を迎へ 聖戰完遂に邁進 『國精』聯盟で行事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5 月 28 日，版 7。

¹⁴¹ 〈滿洲事變記念演講會 十八日臺北公會堂に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9 月 17 日，版 n02；〈陸軍記念日に講演會 臺北公會堂で〉，《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3 月 10 日，版

動員一環，以東臺灣泰雅族利有亨社少女沙韻（或莎勇）為中心的愛國宣傳活動，也在臺北公會堂進行「追憶沙韻少女」紀念演唱會，並於昭和 16 年（1941）2 月 20 日舉行「皇軍慰問學藝會」，由利有亨社女子青年團成員松村美代子演唱「追憶沙韻少女」以為紀念。¹⁴² 凡此種種，臺北公會堂自中日戰爭以來已成為一個「置入」全國性和戰時紀念日與官方政治論述的空間。

此外，作為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之一環，許多文藝宣傳活動也在臺北公會堂舉行。例如，日本「文藝春秋」社長暨文藝家協會會長菊池寬（1888-1948）於昭和 15 年（1940）發起「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也曾於同年 12 月 16 日至 24 日受總督府之邀訪臺，在臺北、新竹、臺中、臺南與高雄等地進行演講會，並到各軍醫院慰問受傷士兵與參拜神社。¹⁴³ 臺北的講演會即在臺北公會堂舉行，而且受到熱烈歡迎，無法入場聽眾甚至得透過擴音器聆聽演講。¹⁴⁴ 菊池寬以〈事變與武士道精神〉為題的演講，強調尊皇、敬神與奉公滅私精神，並提倡捨命為國獻身的皇國精神。¹⁴⁵ 如此，透過藝文性活動之不斷複製與傳播，國民精神總動員官方論述亦得以「置入」臺北公會堂空間，以建構臺灣島民日本國族認同，而希冀達成戰時社會動員之目的。

n02；〈海軍記念日の祝賀會 臺北公會堂で盛大に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5 月 28 日，版 7；〈銃後婦人の集ひ開催〉，《臺北市報》第 638 號，1938 年 8 月 11 日，頁 172。

¹⁴² 〈皇軍慰問學藝會 高砂族青年團大會三日目〉，《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2 月 20 日，版 3；吳佩珍，〈台灣皇民化時期官方宣傳的建構與虛實：論真杉靜枝「沙韻之鐘」翻案作品〉，《臺灣文學學報》17（2010 年 12 月），頁 71；有關日本總督府以「沙韻」少女故事之各式政治宣傳從事戰爭動員之討論，參閱：周婉窈，〈「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周邊波瀾〉，收於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2004），頁 13-31。

¹⁴³ 楊智景，〈戰時下殖民地台灣表象的生成——以一九四〇年「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的訪台為例〉，《臺灣文學學報》8（2006 年 8 月），頁 104、106、109、112。

¹⁴⁴ 〈菊池寬氏ら招いて 文藝銃後講演會 十六日から全島各地で〉，《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2 月 5 日，版 n02；〈文藝銃後運動講演 けふ午後五時開場に變更〉，《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2 月 16 日，版 3；〈銃後人に多大のえ感銘 賑はつた文藝銃後運動講演の夕〉，《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2 月 17 日，版 3。

¹⁴⁵ 楊智景，〈戰時下殖民地台灣表象的生成——以一九四〇年「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的訪台為例〉，頁 115-116。

(四) 皇民奉公運動與大東亞共榮圈論述

在臺北公會堂上演之紀念性、儀式性、展示性與藝文性政治宣傳，進入皇民奉公運動時期持續進行，並反映局勢變遷與政治論述語言之更張。昭和 15 年（1940）10 月，近衛文麿（1891-1945）組織「大政翼贊會」，以「互助相誠，徹底地自覺本身乃是皇國之臣民，凡事率先作國民的推進力，時常與政府建立表裡一致的協力關係，並謀求上意下達、下情上通，努力於高度國防國家體制的建立」為主旨。爾後，因應殖民地個別狀況，分別成立在朝鮮的「國民總力聯盟」、在南樺太的「國民奉公會」、在關東州的「興亞奉公聯盟」，以及在臺灣的「皇民奉公會」。¹⁴⁶ 其中，臺灣皇民奉公會成立於昭和 16 年（1941）4 月 19 日，由總督擔任總裁，其體制涵蓋政府各級組織，規模擴及全臺，包涵日人與臺人菁英，影響及於民間團體，可謂遂行總督府政策的「翼贊」機關。¹⁴⁷

皇民奉公會成立目的在基於臺灣一家理念，深化皇民精神，達成職分奉公的赤誠，確立往後生活體制，協助推進非常時期經濟，並贊翼聖戰之完成與大東亞共榮圈新秩序之建立，最終皇民化臺人，使之經皇民煉成而成為日本人。同時，因應戰局擴大，皇民奉公會被賦予開拓兵源與招募兵員，以及推動職場與經濟新體制與戰時體制之建立等重任。¹⁴⁸ 為達目標，皇民奉公會及其外圍與民間組織，經常舉辦各種宣傳活動，多可見諸臺北地之公會堂，而日治時期臺人如吳新榮與呂赫若等人日記亦多所述及。¹⁴⁹ 以下即以皇民奉公會及其外圍組

¹⁴⁶ 黃昭堂，《台灣總督府》，頁 180-181。

¹⁴⁷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1999 年 6 月），頁 178。

¹⁴⁸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頁 178-183；黃昭堂，《台灣總督府》，頁 184。

¹⁴⁹ 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第二年に於ける皇民奉公運動の実績》（臺北：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1943）；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1943-11-12」，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吳新榮日記/1943-11-12>，2014 年 8 月 15 日瀏覽；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1943-11-13」，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吳新榮日記/1943-11-13>，2014 年 8 月 15 日瀏覽；呂赫若

織集會、戰爭相關展覽、文藝、戲劇等政治宣傳活動為中心進行探討。

首先，臺北公會堂是皇民奉公會總部與臺北州支部等組織舉行集會、儀式與展覽活動之所。皇民奉公會總部成立後，當晚皇民奉公大會即在臺北公會堂舉辦。之後，臺北州支部三千多代表結成式，也在公會堂舉行。¹⁵⁰ 結成式過程中，為戰歿將士英靈默禱與發表式辭之後，長谷川清（1883-1970）總督等主要幹部發表告辭，強調全島一致堅持臣道之實踐與皇國精神之發揮，以完成國防國家體制之建立。隨後，全體一起朗誦「皇民奉公會實踐要綱」，最終以三呼天皇陛下萬歲結束儀式。同樣儀式也先後在新竹、臺中、臺南、高雄、臺東、花蓮與澎湖等支部結成式中反覆重演。¹⁵¹ 爾後，諸如總部與臺北州支部之奉公委員會與臺北州支各式例行會議與活動，在臺北公會堂不斷重複上演，高唱大東亞共榮圈政治論述。¹⁵² 此外，其他諸如文學、美術奉公會組織，以及壯年團、青年團或產業團等組織紛紛設立，並在臺北公會堂舉行大會、展覽會與座談會，隨官方政治宣傳語言起舞，諸如皇國精神之發揚、大東亞共榮圈秩序之建立、志願兵制度之實施與新經濟體制之推展等論述不斷「置入」臺北公會堂空間。¹⁵³ 諸如上述，藉由具固定流程、式辭與口號之儀式性行為，使

著、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1943-11-12」，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呂赫若日記/1943-11-12>，2014年8月15日瀏覽。

¹⁵⁰ 〈皇民奉公の夕べ 十九日夜公會堂で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4月17日，版3；〈皇民奉公の夕べ 今夜臺北公會堂で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4月20日，版n02；〈皇民奉公會臺北州支部 あす公會堂で盛大に結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6月20日，版3。

¹⁵¹ 大澤貞吉，《皇民奉公運動早わかり》（臺北：皇民奉公會宣傳部，1941），頁40。

¹⁵² 〈皇奉運動を一層 清新活潑に推進 十九日參與奉公委員全體會議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6月16日，版n02；〈臺北支部參與奉公委員會 九日臺北公會堂に初會合〉，《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1月8日，版n02；〈皇民奉公會 臺北州支部 舉州必勝體制強化へ 本年初の參與奉公委員會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1月10日，版n02。

¹⁵³ 〈本島人知識階級從軍座談會〉，《部報》52（1939年2月），頁11；〈戰爭第二年に備へ 新性格、行動を凝議 全島奉壯團長會議開かる〉，《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11月28日，版n02；〈銃後若人の士氣昂揚 臺北州下の代表千六百餘名參加 十一月廿九日臺北公會堂に青年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11月7日，版n02；〈經濟研究座談會 けふ經濟關係者參集開かる〉，《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7月4日，版n02；〈戦場の體驗を行動へ 敵國て仰ぐ“日の丸”の逞しさを痛感 第二回特設勞務奉公團從軍座談會きのふ開催〉，《臺灣日日新報》，

皇民奉公思想得以層層普及深化，而臺北公會堂的官式意義也更形鞏固，也隨時空變遷被「置入」各種不同官方政治論述，成為建構臺灣島民日本帝國與國族認同之空間基礎。

其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諸如皇軍慰安會、戰利品與美術展覽會等活動也開始出現。為激勵士氣，皇民奉公會及其外圍組織，如壯年奉公團與產業奉公團等，推動戰事相關紀念、儀式與展示活動，以宣傳「大東亞共榮圈」論述，藉此建構舉國一致、全島一致之國族認同。例如，昭和 17 年（1942）2 月 13 日起，「大東亞戰爭展覽會」在臺北公會堂等地舉辦，藉戰利品展覽激勵人心，呈現皇軍決戰與建立大東亞新秩序決心。¹⁵⁴ 杜淑純即曾回憶她在公會堂觀賞「決戰生活展覽會」紀錄片的經驗，且述及「公學校的老師們會帶學生去看藉以宣傳」一語。¹⁵⁵

再者，美術奉公會也以視覺化方式記錄將士戰場英姿，以戰爭畫再現「大東亞共榮圈」論述。例如，昭和 16 年（1941）9 月 11 日起五日，「創元美術協會」發起展示由飯田實雄（1905-1968）等畫家創作之「聖戰美術展覽會」，並集結出版《臺灣聖戰美術》畫冊，¹⁵⁶ 可謂太平洋戰爭與皇民奉公運動之文化記憶媒介。昭和 17 年（1942）7 月 1 日起「創元美術協會」又舉辦「大東亞戰爭美術展」，於臺北公會堂展示十天，期間長谷川清總督也曾蒞臨參觀。¹⁵⁷ 同

1942 年 7 月 25 日，版 3。

¹⁵⁴ 〈決戰下意義深き 大東亞戰爭展覽會 けふ島民絶大な期待裡に開幕〉，《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2 月 8 日，版 n02；〈皇軍奮戦の跡を偲ぶ 大東亞戰爭戦利品展覽 けふ臺北公會堂で一般に公開〉，《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3 月 11 日，版 n03；〈海軍戦利品展覽會 けふ臺北市公會堂で開幕〉，《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5 月 25 日，版 3；〈皇軍慰問品 臺北公會堂で 十日から展示〉，《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3 月 6 日，版 n02。

¹⁵⁵ 杜淑純口述，曾秋美、尤美琪訪問整理，《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5），頁 188。

¹⁵⁶ 飯田實雄，《臺灣聖戰美術》（臺北：創元美術協會，1941 年）；〈聖戰美術展 十一日から公會堂で開く〉，《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9 月 9 日，版 3；〈臺灣聖戰美術展に就て〉，《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9 月 11 日，版 n04。

¹⁵⁷ 〈第二回聖戰美術展 支那事變記念日とし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6 月 4 日，版 3；〈大東亞戰爭美術展 けふから十日間市公會堂に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7 月 1 日，版 3；〈大東亞戰爭美術展に長谷川總督臨場〉，《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7 月 9 日，版 n02。

樣，昭和 18 年（1943）5 月 5 日成立的「臺灣美術奉公會」，也在臺北公會堂先後舉辦大東亞戰爭二週年紀念捐獻畫展與必勝美術展。¹⁵⁸ 諸如此類之畫作或美術展覽會，正可謂為皇民奉公運動與「大東亞共榮圈」政治論述之載體，亦被「置入」臺北公會堂空間。

最後，隨著日本大政翼贊運動文化建設之進展，臺灣皇民奉公會也開始推動文學政治宣傳。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大政翼贊會隨即於昭和 16 年（1941）12 月 24 日舉行「文學者愛國大會」，並於次年 5 月 26 日組成「日本文學報國會」。「文學報國會」先後三次在昭和 17 年（1942）11 月、昭和 18 年（1943）8 月與昭和 19 年（1944）1 月，召開「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等藝文形式之政治宣傳。其中，臺人張文環（1909-1978）、龍瑛宗（1911-1999）與楊雲萍（1906-2000）等作家曾以「外地代表」身份，先後參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並回臺演講進行宣傳。¹⁵⁹ 作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宣傳活動之一環，臺灣文藝家協會即曾於昭和 17 年（1942）12 月 2 日起先後在臺北、新竹、臺中與高雄舉辦「大東亞文藝講演會」。在臺北公會堂的講演會中，張文環與龍瑛宗即常複製「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官方論述，使用亞細亞一體、八紘一字、道義文化、肇國精神等官方語彙。¹⁶⁰

跟隨大政翼贊運動腳步，臺灣開始推動文學奉公運動。臺灣皇民奉公會於昭和 17 年（1942）8 月 8 日成立文化部，緊接著文學報國會也於昭和 18 年（1943）4 月 10 日在臺灣成立支部，最後臺灣文學奉公會於 4 月 29 日成立，負責推動皇國文學者世界觀之確立、協助文藝政策之樹立與推行、以文學昂揚

¹⁵⁸ 〈戰意昂揚“獻納畫展” 十四日より臺北公會堂で公開〉，《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12 月 13 日，版 n02。

¹⁵⁹ 王惠珍，〈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虛與實：以龍瑛宗的文藝活動為例〉，《台灣學誌》1（2010 年 4 月），頁 33-60；李文卿，〈穿越皇民化運動時期的動員表象——《決戰台灣小說集》的編輯結構析探〉，《中極學刊》1（2001 年 12 月），頁 221-230。

¹⁶⁰ 〈大東亞文藝講演會あす公會堂に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12 月 1 日，版 3；〈大東亞文藝講演會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12 月 4 日，版 n02；〈大東亞文藝講演會全島主要都市で公開〉，《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12 月 12 日，版 n02。

皇民精神、以文學提高皇民教養、通過文學宣傳國策、推動國語純化並將其普及於南方共榮圈等任務。在文學奉公會諸多活動中，以「文學報國演講會」與「臺灣決戰文學會議」為最要。昭和 18 年（1943）2 月 28 日，「日本文學報國會」臺灣支部與皇民奉公會在臺北公會堂舉辦「文學報國講演會」，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理念，強調為完成大東亞戰爭目標，所有文藝者應成為一家，確立日本文學新體制。¹⁶¹ 同年 11 月 12-13 日，「臺灣文學奉公會」在臺北公會堂發起「臺灣決戰文學會議」，配合戰爭局勢發展，討論本島文學決戰態勢之確立、文學家之戰爭協力，及其理念與實踐方針等議題。¹⁶² 臺人龍瑛宗、張文環、楊逵、周金波、陳火泉、呂赫若、吳新榮等人參加了會議，其中呂赫若與吳新榮都曾留下相關日記記述。由於戰爭局勢進入決戰期，臺灣皇民奉公會呼應日本「大政翼贊會」強調文學性政治宣傳的重要性，故由臺灣文學奉公會推動皇民文學運動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理念，臺北公會堂再度被「置入」官方論述之文學性活動，茲以建構臺灣島民之日本國族認同。

此外，日治時期官方論述在公會堂之展演，也常以戲劇、歌唱等其他多元方式表現。例如，青年劇運動、新劇運動、兒童劇運動、甚至改良式布袋戲，都成為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體制下的宣傳工具。¹⁶³ 例如，為從事精神總動員

¹⁶¹ 〈文藝報國講演會 明夕島都で獅子吼〉，《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2 月 28 日，版 n02；〈前線銃後繫ぐ楔 指導精神の根幹、文化の創造こそ大 文學戰士烈々の雄叫び〉，《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3 月 1 日，版 3。

¹⁶² 根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藏「楊雲萍文書」，當中可見「臺灣文學奉公會」所寄相關信函，以及「臺灣決戰文學會議」開會通知與會議要項文件，參閱：「臺灣文學奉公會所寄之信函」（YP02_01_072），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search_detail.jsp?xmlId=0000029357，2014 年 8 月 12 日瀏覽。

¹⁶³ 柳書琴，〈「總力戰」與地方文化：地方文化論述、台灣文化甦生及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台灣社會研究》79（2010 年 9 月），頁 91-158；郭美君，〈成為日本人的神話操演：以宗教社會風俗的變革看戰爭下的皇民化運動〉，《國文經緯》6（2010 年 11 月），頁 19-32；李文卿，〈被動員的「鄉土藝術」：黃得時與太平洋戰爭期的布袋戲改造〉，《臺灣文學研究集刊》8（2010 年 8 月），頁 59-84；石婉舜，〈「黑暗時期」顯影：「皇民化運動」下的臺灣戲劇（1936.9-1940.11）〉，《民俗曲藝》159（2008 年 3 月），頁 7-81；簡秀珍，〈觀看、演練與實踐——臺灣在日本殖民主義時期的新式兒童戲劇〉，《戲劇學刊》15（2012 年 1 月），頁 7-48；石婉舜，〈「厚生演劇研究會」

運動，「日高兒童樂園」於昭和 12 年（1937）7 月 21 日在臺北公會堂舉行第一回公演，其中除童謠與舞踊表演之外，也包括演出改編自《忠臣藏》的《兒童忠臣藏》。¹⁶⁴ 在皇民奉公運動時期，「臺灣演劇協會」所屬之「藝能文化研究會」，在松居桃樓與竹內治指導下，演出許多服膺時局官方論述之新劇，如其中被讚譽為「描寫出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邁進的不屈魂魄」的《赤道》，便在臺北公會堂演出。¹⁶⁵

總之，臺北公會堂在落成前已成為臺灣總督府「置入」其歷史與政治論述之空間，在正式落成後，因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特別歷史脈絡，歷經國民精神總動員與皇民奉公運動等紀念性、儀式性、展示性與藝文性政治宣傳活動之洗禮，成為建構臺灣島民日本國族認同的空間，而使其官式空間意義更趨明顯與鞏固。

四、從公會堂到中山堂：代結論與展望

戰後臺北公會堂改名為中山堂，在戒嚴時期成為國民黨政權展示官方意識形態與中國想像之空間。民國 34 年（1945）10 月 25 日，臺北公會堂卸下日本帝國面紗，轉化為國民黨治臺權力場域。當日，公會堂大宴會廳成為陳儀代表中華民國接受安藤利吉（1884-1946）簽署投降書之地點，極具歷史意義，後來易名為光復廳，象徵臺灣再度「合」於中國。民國 34 年（1945）年 12 月 19 日，全臺公會堂改稱中山堂，臺北公會堂亦正式易名為中山堂，不但曾為立法院、國民大會、臺北市參議會與市議會等政治集會之所，成為見證臺灣從日治到戰後政治權力轉折與發展的「記憶所繫之處」。

戒嚴時期的中山堂，具體化了國民黨政權的意識形態與中國想像。首先，

初探》，《臺灣史研究》7：2（2000 年 12 月），頁 95-115；邱坤良，〈理念、假設與詮釋：臺灣現代戲劇的日治篇〉，《戲劇學刊》13（2011 年 1 月），頁 7-34。

¹⁶⁴ 簡秀珍，〈觀看、演練與實踐——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新式兒童戲劇〉，頁 16-17。

¹⁶⁵ 石婉舜，〈「厚生演劇研究會」初探〉，頁 107-108。

國民黨治臺後致力修改臺灣地名與路名，涉及命名政治學，是為中國國族認同建構一環。¹⁶⁶ 同樣，公會堂易名中山堂，乃國民黨以孫中山符號合法化並鞏固其政權之政治文化的在臺延續。自民國 14 年（1925）年 4 月 1 日國民黨中執會倡建中山堂，並於民國 15 年（1926）成立「建築總理紀念堂委員會」以來，中山堂作為「國家的象徵」與「鞏固黨國的基礎」，開始出現在中國全國地景。¹⁶⁷ 作為中山符號延伸，諸如「中山室」與「總理紀念室」等空間出現在各政府單位。

此一中山符號空間之建構，在戰後隨〈修建中山堂辦法〉之頒行臺灣，漸漸普及，可見諸主要城市到各機關單位如花蓮林田山林業農場的中山堂，還有軍中的中山室。根據辦法，由於「缺乏可以代表共同信仰之場所」，對「國民道德與民族性格」與「三民主義深入人心」影響巨大，建國「尤當加強此種共同之信仰」。是故，「普遍興建中山堂為培育人民共同信仰之場所」，以「國父所提倡之八德為共同信仰之準則」作為「牢固不拔之社會基礎」，使「三民主義深植人心、行乎自然」。為此目的，各地應根據〈中山堂建築及設備標準〉，打造「建築物式樣均一律相同」的中山堂，諸如「置國父畫像或塑像，內額『禮義廉恥』，外額懸中山堂」，而且「可將國父遺教及十二守則砌石砌於四壁」。¹⁶⁸ 據此，臺灣省政府在民國 37 年（1948）要求各縣市政府遵照〈修建中山堂辦法〉管理各社政機構的中山堂。¹⁶⁹

在此官方致力推廣的中山符號空間建構趨勢下，中山符號也同步複製於

¹⁶⁶ H. Leitner and Peter Kang (康培德), "Contested Urban Landscapes of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Taipei," *Ecumene* 6 (April 1999), pp.214-233.

¹⁶⁷ 陳蘊茜, 《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頁 325-389。

¹⁶⁸ 〈中山堂修建辦法〉，《國民政府》，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100-00029；「奉令抄發修建中山堂辦法令仰遵照由」〈普通法令〉，《臺灣高等法院》，新北：國家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504000000F/0039/牘/113/1/001。

¹⁶⁹ 〈為各縣市政府對中山堂改隸社政機構管理一案〉，〈各縣市中山堂改隸〉，《臺灣省政府》，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檔案管理局，檔號：A375000000A/0037/0017.1/0313/0001/001；「為各縣市政府對中山堂改隸社政機構管理一案」〈各縣市中山堂改隸〉，《臺灣省政府》，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檔案管理局，檔號：A375000000A/0037/0017.1/0313/0001/002。

各種文化媒介。例如，民國 38 年（1949）國慶日，蒲添生（1912-1996）設計的孫中山銅像出現在中山堂門前廣場，不但深具象徵意義，更將中山堂一隅之空間建構延伸至廣場。¹⁷⁰ 中山堂本身亦進一步符號化，不但成為民國 36 年（1947）光復紀念郵票主題，7 次成為愛國獎券之主題圖案，僅次於總統府之 8 次，不但承載「打倒俄寇」與「反共復國」官方語彙，更融入臺灣戰後日常生活記憶之中。¹⁷¹ 於是，戰後中山堂之「硬體」與「軟體」形同三民主義意識形態之物質化與空間化載體，成為國民黨政權合法性與國族認同建構之基礎。

因此，戰後初期的中山堂，與日治時期末期的臺北公會堂一樣，緣於非常時期的時代特性，都是宣傳官方意識形態與政治論述的空間，極具官式意義。例如民國 35 年（1946）6 月 16 日成立的臺灣文化協進會，以「聯合熱心文化教育之同志及團體，協助政府宣揚三民主義，傳播民主思想，改造臺灣文化，推行國語國文」為宗旨，便經常在中山堂舉辦文化講座、座談會、音樂會、展覽會與國語演講比賽等致力於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等改造臺灣文化的各種活動。¹⁷²

中山堂也成為臺灣戰後初期與冷戰時期社會各群體的「記憶所繫之處」。例如，作為「臺灣光復記憶」一部分，「臺灣光復致敬團」結束中國參觀致敬之旅後，於民國 35 年（1946）10 月 6 日在中山堂舉辦成果說明。¹⁷³ 同月 25 日，首度來臺的蔣介石，在中山堂參加慶祝臺灣光復節週年紀念大會，與臺灣

¹⁷⁰ 有趣的是，孫中山銅像基座原是日治時期西門橢圓公園裡第四任民政長官祝辰巳（1868-1908）紀念雕像之基座，參閱：林英斌，〈蒲添生孫中山立像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頁 32、44；陳譽仁，〈藝術的代價——蒲添生戰後初期的政治性銅像與國家贊助者〉，《雕塑研究》5（2011 年 4 月），頁 28。

¹⁷¹ 劉筆卿，〈臺灣人的發財夢：愛國獎券〉（臺北：臺灣書房出版社，2008），頁 110；第 120、121 期愛國獎券皆以中山堂為主題圖案，並配上「打倒俄寇」、「重建家園」、「擁護領袖」、「反共復國」等政治標語，參見前著附錄。

¹⁷² 王玉國，〈從公會堂到中山堂：公共空間的歷史轉變〉，《閩臺文化研究》42（2015 年），頁 14-19。

¹⁷³ 許雪姬，〈「臺灣光復致敬團」的任務及其影響〉，頁 128。

群眾進行了第一次公開接觸。¹⁷⁴ 從中國來臺的軍警與臺灣人日常記述，也常將「臺灣光復記憶」與中山堂聯繫在一起。¹⁷⁵ 又如，二二八事件後，3月2日至3月8日期間，「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也在中山堂召開，成為臺灣的「記憶所繫之處」。其他，例如民國43年（1954）12月3日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等歷史特定關鍵時刻，都與中山堂一隅空間密切聯繫。

戒嚴時期的中山堂，儼然國民黨政權書寫官方反共抗俄政治論述之空間。不管集會性質為何，根據當時的「中山堂管理辦法」，任何活動均需事先申請核准，務必使「中山堂一切集會活動，都能切合反共抗俄的要求」，¹⁷⁶ 才能在中山堂舉辦活動。此外，為與中共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禮，取得中國文化正統地位，蔣介石於民國55年（1966）提議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山堂不但是次年「中華文化復興推動委員會」臺北分會成立大會的地點，更是許多立意促進中華文化復興文藝活動的櫥窗，而孫中山之誕辰亦為「中華文化復興節」。

中山堂生命史在20世紀末進入民主化時期，雖平時政治色彩逐漸淡化，文化功能更加突顯，但自1980年代末，中山堂廣場逐成為在野力量「佔領」並提出解嚴、中央民代全面改選、臺北市長民選、總統民選等民主改革訴求的空間。當時黨外或民間雜誌，對此時中山堂生命史記述豐富，可藉進一步以分析在野社群對中山堂空間意義的認知取向。1990年代初，隨著野百合學運之發展，中山堂不再是臺灣政治運動中心，迅速被中正紀念堂取代。直到1990年代中，因國民黨政府推動在中山堂廣場興建「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

¹⁷⁴ 葉惠芬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第67冊》，頁362-368。

¹⁷⁵ 例如：蔡慧玉訪問，吳美慧記錄，《光復臺灣與戰後警政：「臺灣警察幹部訓練班」口述訪談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3），頁42-43、90、151、245、303、339、387；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頁329、353-354；楊基振作，黃英哲、許時嘉編譯，「楊基振日記/1947-10-25」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楊基振日記/1947-10-25>，2014年8月17日瀏覽；相關討論可參見：許雪姬，〈臺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日記如是說「終戰」〉，《台灣文學學報》13（2008年12月），頁151-178。

¹⁷⁶ 〈使用中山堂須 經過申請核准 俾集會符合反共要求〉，《中央日報》，1950年7月4日，版4。

碑」，引起臺灣各社群對於抗戰與光復記憶之對抗，中山堂才再度成為焦點，而其空間意義也再經變遷、延展與增生。臺灣各社群對日治與二戰的記憶戰爭，便具體化在紀念碑之興建爭議，以及其於民國 88 年（1999）落成時「有碑無文」的窘困之上，都需另外闢文剖析。

進入 21 世紀，雖紀念碑之興建使中山堂空間仍具記憶政治意義，但整體而言空間以文化轉型為基調。民國 80 年（1991），臺北市民政局決定整修中山堂，到民國 87 年（1998）始動工整修。民國 88 年（1999），中山堂改隸臺北市文化局。整建後的中山堂，於民國 90 年（2001）底重新開放，雖正面廣場樹立起「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但文藝色彩較為突出，除了各項文藝以及與臺灣光復或臺北市歷史相關之展覽與儀式活動以外，民國 100 年（2011），9 月以宣揚經典與傳承中華文化為使命之「臺北書院」的設立值得進一步檢視。

臺北公會堂於戰後易名為中山堂，且其空間意義隨時代變遷更形多元，但本文旨在深入探究臺北公會堂之興建過程的基礎上，聚焦探析其官式空間意義之建構與變遷歷程，及其於日治戰時體制時期國族認同形塑之關係，無法及於全部面向且深入考察戰後中山堂空間生命史。由本文論證可知，受限於其興建、落成於接近戰爭爆發與後續戰時體制時期的特殊微觀時代性，臺北公會堂的官式空間意義非常鮮明，使公會館原初規劃為市民集會與藝文活動的空間功能遭到限縮，而與其他較早興建的日本公會堂和日治時期臺灣公會堂於戰爭爆發之前所呈現的空間功能與意義有所差異，而此一差異也需進一步比較。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所舉辦之紀念性、儀式性、展示性與藝文性政治宣傳活動，其類型非僅本文所述，形式也非常多元，無法全面概括。本文於探討臺北公會堂興建過程中雖已觸及該空間意義認知的社群差異性與多元性，但仍須進一步深究各種民間社群不同的認知取向與內涵。以臺灣 20 世紀長時段歷史視考察臺北公會堂一隅空間功能與意義之建構與變遷言，戰後中山堂一隅空

間的各時期發展與變遷，也猶待深究。¹⁷⁷ 總之，本文作為臺北公會堂一隅空間歷史研究之起點，無法顧及全部面向，但希冀在代結論中提出初步思考，從中提議未來可行之研究方向與問題。

首先，本文以微觀角度，探究日治初期總督府廳舍之拆遷至臺北公會堂之興建的歷程，並歸納其中所涉記憶與族群差異政治。本文發現，臺北公會堂興建過程中，臺人展現出對於三市街區域中權力與資源分配之族群差異的焦慮，也體現在他們對於公會堂空間意義的另類認知之中。換言之，臺北公會堂本身，即是日治時期日人與臺人族群差異與身份認同的空間化表現。

其次，日治初期總督府舊廳舍拆遷的例子，說明統治政權面對前朝文物遺跡，不必然只有完全拆毀的選擇。臺北公會堂建地原址前清建物在日治時期不但成為日治始政儀式的「記憶所繫之處」，更是日治初期總督府舊廳舍所在，因此而被賦予嶄新的空間意義，是故總督府在市區改正與臺北公會堂興建過程中都力主保留，且在「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實施之際，經各方協商設法以拆遷方式處理，使得部分建築體得以留存至今。

第三，本文探究臺北公會堂在始政博覽會、國民精神總動員與皇民奉公運動等日治末期政治運動脈絡下其官式空間意義的不斷建構與變遷歷程，一方面藉由文藝創作洞悉前清遺老對漢民族文化的認同與懷舊情結，及其具體展現在對前清建築消失於臺北地景空間的失落之感，所映照之相異於官方臺北公會堂空間意義的另類認知，另一方面藉由報刊等文獻論證臺北公會堂緣於其誕生之時代特性，歷經各種戰時官方政治宣傳運動之洗鍊，而使得其相較於日本與臺灣其他城市較早興建之公會堂於戰時體制時期之前的空間功能與意義更具官式色彩。更要者，透過各種紀念性、儀式性、展示性與甚至藝文性活動，國民精神總動員與皇民奉公運動之政治論述亦得以「置入」臺北公會堂，使其成為建構臺灣島民日本國族認同之官式空間。同理，日治時期臺北市其他

¹⁷⁷ 關於臺北中山堂於戰後作為藝文空間之生命史，可參閱：曾筱甯，〈眾樂之堂：臺北中山堂（公會堂）藝文展演研究〉，頁 69-196。

空間，例如今日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所在之臺北公園所呈現的空間意義建構與變遷，亦值得進一步探究。再者，就其於國族認同形塑的空間意義言，戰後中山堂在臺灣民主化發展之前，亦成為國民黨政權推行「中國化」政策而形塑臺灣人為中國人的政治性場域。

第四，就臺北公會堂緣於社群差異之空間意義的多元性而言，在有關臺北公會堂建設爭議的論述中，本文已突顯當時臺人另類認知該建設項目只是為了滿足當權者的「誇耀心」與「摩登慾」而異於官方政策。但是，在其落成之後，處於戰時政治運動氣氛下，臺北公會堂成為官方「置入」歷史與政治論述的壟斷性空間，日治時期臺人是否有機會如戰後民國 34 年（1945）7 月郭琇琮在中山堂上演改編的改良歌仔戲《新白蛇傳》，而在公會堂空間中「置入」另類論述？或者必須「佔據」公會堂以外空間建構其對抗性論述，如日治末期「厚生演劇研究會」於昭和 18 年（1943）9 月 3 日起連續六晚於臺北永樂座上演《閩雞》、《高砂館》等具臺灣主體性精神之演出，以文學、戲劇與歌曲等媒介發出另類聲音？¹⁷⁸ 同理，戰後中山堂除了是一個由國民黨政權壟斷而植入其政治意識形態與論述的官式意義空間之外，是否如民國 64 年（1975）6 月楊弦的「中國現代民歌」演唱會，或民國 67 年（1978）12 月的「中山堂事件」，民間社群也得以在該空間「置入」對抗性另類論述與意義認知的可能呢？¹⁷⁹ 在國族論述之外，臺北公會堂或戰後中山堂，是否也能夠成為庶民日常生活記憶的「記憶所繫之處」，且被植入另類的空間意義認知呢？諸如此類之議題，都

¹⁷⁸ 石婉舜，〈「厚生演劇研究會」初探〉，頁 109-111；陳培豐，〈從三種演歌來看重層殖民下的臺灣圖像——重組「類似」凸顯「差異」再創自我〉，《臺灣史研究》15：2（2008 年 6 月），頁 79-133；陳培豐，〈鄉土文學、歷史與歌謠：重層殖民統治下臺灣文學詮釋共同體的建構〉，《臺灣史研究》18：4（2011 年 12 月），頁 109-164；石計生，〈臺灣歌謠作為一種「時代盛行曲」：音樂台北的上海及諸混血魅影（1930-1960）〉，《臺灣社會學刊》47（2011 年 9 月），頁 91-141。

¹⁷⁹ 張炎憲、胡慧玲，《臺北都會二二八》，頁 128；陶曉清，〈校園民歌的故事〉，收於人間副刊主編，《回到中山堂》，頁 96-99；夏鑄九，〈公會堂與大稻埕南街——殖民城市的中心廣場與反殖民城市的對抗性都市空間狹縫〉，頁 157；中央月刊編輯部，〈對一二二五中山堂事件各界的反應〉，《中央月刊》22：1（1989 年 1 月），頁 96-102。

猶待進一步深究，以呈現臺北公會堂生命史及其空間意義之多元性。

本文檢視日治時期臺北公會堂官式空間意義之建構與變遷，其成果不但可作為未來進而探討不同社群於不同歷史時期對該空間之多元意義認知與變遷的基礎，也是未來延伸從事戰後中山堂、「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以及臺北「歷史記憶區」中二二八和平紀念碑／公園、中正紀念堂、凱達格蘭大道、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與反貪腐民主廣場等臺灣國族「記憶所繫之處」等研究之起點。

引用書目

《中央日報》

《省級機關檔案》

《國民政府檔案》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臺北市報》

《臺北州報》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史料稿本》

《臺灣民報》

《臺灣高等法院普通法令檔案》

《臺灣新民報》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臺灣總督府府報》

人間副刊主編

2002 《回到中山堂》。臺北：臺北市文化局。

大澤貞吉

1941 《皇民奉公運動早わかり》。臺北：皇民奉公會宣傳部。

山村光尊編

1940 《臺北市政二十年史》。臺北：臺北市役所。

不著撰人

1925 〈始政三十年記念展覽會交通館記〉，《臺灣遞信協會雜誌》68：2-58。

1930 〈市政會館及日比谷公會堂建築工事概要〉，《都市問題》10（1）：233-237。

1936 《臺北市公會堂建築工事概要》。臺北：出版者不詳。

中央月刊編輯部

1989 〈對一二二五中山堂事件各界的反應〉，《中央月刊》22（1）：96-102。

井手薰

1930 〈總督府舊廳舎の保存に就て〉，《臺灣時報》133：51-55。

1937 〈臺北市公會堂落成式に於ける工事報告〉，《臺灣建築會誌》9（3）：250-255。

王月鏡纂修

1988 《臺北市志 卷八 文化志勝蹟篇》。臺北：臺北文獻委員會。

王玉國

2015 〈從公會堂到中山堂：公共空間的歷史轉變〉，《閩臺文化研究》2：14-19。

王志弘

1996 〈台北新公園的情慾地理學：空間再現與男同性戀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195-218。

王紹傑

2016 〈臺灣日治時期公會堂建築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惠珍

2010 〈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虛與實：以龍瑛宗的文藝活動為例〉，《台灣學誌》1：33-60。

田中一二編

1931 《臺北市史》。臺北：臺灣通信社。

田中一二編，李朝熙譯

1998 《臺北市史：昭和六年》。臺北：臺北市文獻會。

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

2012 《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

石計生

2011 〈臺灣歌謠作為一種「時代盛行曲」：音樂台北的上海及諸混血魅影〉，《臺灣社會學刊》47：91-141。

石婉舜

- 2000 〈「厚生演劇研究會」初探〉，《臺灣史研究》7(2)：95-115。
- 2008 〈「黑暗時期」顯影：「皇民化運動」下的臺灣戲劇(1936.9~1940.11)〉，《民俗曲藝》159：7-81。
- 2010 〈被動員的「鄉土藝術」：黃得時與太平洋戰爭期的布袋戲改造〉，《臺灣文學研究集刊》8：59-84。

朱家瑩

- 2012 〈臺灣日治時期的公共雕塑〉，《雕塑研究》7：23-73。

朱萬里等纂修

- 1966 《臺北市志 卷三 政制志建設篇、戶政篇、役政篇》。臺北：臺北文獻委員會。

朱萬里纂修

- 1957 《臺北市志稿 卷三 政制志建設篇》。臺北：臺北文獻委員會。

王詩琅、朱點人著，張恒豪編

- 1991 《王詩琅、朱點人合集》。臺北：前衛出版社。

吳佩珍

- 2010 〈台灣皇民化時期官方宣傳的建構與虛實：論真杉靜枝「沙韻之鐘」翻案作品〉，《臺灣文學學報》17：67-100。

呂紹理

- 2005 《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

李文卿

- 2001 〈穿越皇民化運動時期的動員表象——《決戰台灣小說集》的編輯結構析探〉，《中極學刊》1：207-230。

李汝和主修

- 1970 《臺灣省通志 卷一 土地志勝蹟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李乾朗

- 1979 《臺灣建築史》。臺北：雄獅。
- 1996 《台灣近代建築——起源與早期之發展 1860-1945》。臺北：雄獅圖書。

李瑞宗

- 2007 《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臺的新透視》。臺北：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杜淑純口述，曾秋美、尤美琪訪問整理

2005 《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

赤阪清七

1925 〈臺灣始政三十年紀念展覽會〉，《臺灣時報》69：17-34。

周婉筠

2004 《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

林品章、林文通

2005 〈日治時期始政三十年紀念展覽會之研究〉，《設計學研究》8（1）：1-24。

林英斌

2009 〈蒲添生孫中山立像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

邱坤良

2011 〈理念、假設與詮釋：臺灣現代戲劇的日治篇〉，《戲劇學刊》13：7-34。

柯勝釗

2002 〈日治時期台南社會活動之研究——以台南公會堂為例〉。臺南：國立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柳書琴

2010 〈「總力戰」與地方文化：地方文化論述、台灣文化甦生及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台灣社會研究》79：91-158。

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

1943 《第二年に於ける皇民奉公運動の実績》。臺北：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

2014 《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范燕秋

2012 〈日治初期的臺灣博物學會——日本博物學家與臺灣自然史的建構〉，《師大台灣史學報》5：3-40。

原幹州

1937 《臺灣史蹟》。臺北：拓務臺灣評論支社。

栗山俊一

- 1930 〈臺灣總督府舊廳舎の保存〉，《臺灣建築會誌》2（5）：1-3。

堀込憲二

- 2011 〈日治時期臺灣近代建築外牆磁磚形式與色彩變遷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8：19-48。

張炎憲、胡慧玲

- 1996 《臺北都會二二八》。臺北：吳三連基金會。

許南英

- 1962 《窺園留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許雪姬

- 1999 〈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167-211。
2008 〈臺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日記如是說「終戰」〉，《台灣文學學報》13：151-178。
2011 〈「臺灣光復致敬團」的任務及其影響〉，《臺灣史研究》18（2）：97-145。

許雪姬編

- 2010 《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連橫

- 1979 《臺灣通史》。臺北：眾文出版社。

郭俊沛

- 2005 《彰化縣歷史建築：彰化市中山堂（公會堂）調查研究》。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2006 《彰化縣歷史建築彰化市中山堂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郭美君

- 2010 〈成為日本人的神話操演：以宗教社會風俗的變革看戰爭下的皇民化運動〉，《彰化師大國文經緯》6：19-32。

陳芳明

- 2004 《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臺北：麥田。

陳培豐

- 2008 〈從三種演歌來看重層殖民下的臺灣圖像——重組「類似」凸顯「差異」再創自我〉，《臺灣史研究》15(3): 79-133。
- 2011 〈鄉土文學、歷史與歌謠：重層殖民統治下臺灣文學詮釋共同體的建構〉，《臺灣史研究》18(4): 109-164。

陳凱雯

- 2005 〈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7 〈日治時期基隆公會堂之研究——兼論基隆地方社會的發展〉，《海洋文化學刊》3: 75-105。

陳蘊茜

- 2009 《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陳譽仁

- 2011 〈藝術的代價——蒲添生戰後初期的政治性銅像與國家贊助者〉，《雕塑研究》5: 1-60。

陶文輝、曹甲乙纂修

- 1959 《臺灣省通志稿 卷一 土地志勝蹟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鹿又光雄編

- 1939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臺北：臺灣博覽會誌。

傅朝卿

- 1999 《日治時期臺灣建築 1895-1945》。臺北：大地地理。

曾筱甯

- 2016 〈眾樂之堂：臺北中山堂（公會堂）藝文展演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程佳惠

- 2004 《台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 年魅力台灣 SHOW》。臺北：遠流。

飯田實雄

- 1941 《臺灣聖戰美術》。臺北：創元美術協會。

黃春成纂修

1958 《臺北市志稿 卷八 文化志名勝古蹟篇》。臺北：臺北文獻委員會。

黃昭堂

2013 《台灣總督府》。臺北：前衛出版社。

黃英哲

2007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

黃富三

2011 〈清季臺灣之外來衝擊與官紳關係：以板橋林家之捐獻為例〉，《臺灣文獻》62(4)：131-159。

新藤浩伸

2014 《公会堂と民衆の近代》。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楊仁江

1995 《臺閩地區第二級古蹟檔案圖說》。臺北：內政部。

楊智景

2006 〈戰時下殖民地台灣表象的生成——以一九四〇年「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的訪台為例〉，《臺灣文學學報》8：97-121。

溫祝羚

2012 〈空間元素的並列到調和：以日治時期并手黨主導之建築活動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倫會

2006 《台北城的故事》。臺北：蘭臺出版社。

葉惠芬編

2012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第67冊》。臺北：國史館。

臺北市役所

1928 《臺北市案内》。臺北：臺北市役所。

臺灣博物學會

- 1924 〈臺灣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保存に對する建議案〉，《臺灣博物學會會報》68：41-42。
- 1924 〈臺灣に於ける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の廢滅及び變形せんとする主なるもの、調書〉，《臺灣博物學會會報》68：42-43。

臺灣總督府

- 1930 《本島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概況》。臺北：總督府內務局。
- 1938 《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實施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
- 1985 《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 第 68 冊》。臺北：成文。

劉葦卿

- 2008 《臺灣人的發財夢：愛國獎卷》。臺北：臺灣書房出版社。

劉顏寧總編纂

- 1984 《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一 大事志》。臺北：臺灣省文獻會。

歐素瑛

- 2007 〈素木得一與臺灣昆蟲學的奠基〉，《國史館學術集刊》14：133-180。

稻垣其外

- 1937 《北白川宮》。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

蔡慧玉訪問，吳美慧記錄

- 2013 《光復臺灣與戰後警政：「臺灣警察幹部訓練班」口述訪談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蔡錦堂

- 2007 〈「紀元兩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師大台灣史學報》1：51-88。

蔣竹山編

- 2019 《當代歷史學新趨勢：理論、方法與實踐》。臺北：聯經。

橋本白水

- 1926 《島の都》。臺北：南國出版協會。

戴振豐

- 2004 〈日治時期台灣「建國祭愛馬行進」、「愛馬日」、「軍馬祭」的形成與進行（1936-1945）〉，《政大史粹》6：61-94。

簡秀珍

- 2012 〈觀看、演練與實踐：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新式兒童戲劇〉，《戲劇學刊》15：7-48。

蘇碩斌

- 2010 《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臺北：群學。

Ben-Amos, Dan and Weissberg, Lillane, ed.

- 1999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hoay, Françoise

- 2001 *The Invention of the Historic Monu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esswell, Tim

- 2004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Daum, Andreas W. and Mauch, Christof, ed.

- 2005 *Berlin-Washington, 1800-2000: Capital Citie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ichel

-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Leitner, H. and Peter Kang

- 1999 “Contested Urban Landscapes of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Taipei.” *Ecumene* 6: 214-233.

Nora, Pierre

- 1989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Les Lieux de Me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5.

Riegl, Alois

- 1982 “The Modern Cult of Monuments: Its Character and Its Origin.” *Oppositions* 25: 21-51.

Till, Karen

- 2003 “Places of Memory.” In J. Agnew, K. Mitchell, G. Ó Tuathail, ed.,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pp. 289-301.

「臺北市中山堂」，<https://www.zsh.gov.taipei/>。

「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

「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https://archives.ith.sinica.edu.tw/>。

The Construction of Taipei Public Hall and the Making of its Spatial Symbolism

Tsung-Yi Pan

Abstract

In the landscape of “Taipei Memory District,” many memorial spaces and objects were constructed in the course of Taiwanese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se memorial spaces and objects can be examined as “memory vehicles” or “realms of memory” that materialize and carry Taiwanese people’s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several defining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from the period of Qing rule through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o the period of Guomintang rule. Take Zhongshan Hall as an example, its building was constructed by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as Taipei Public Hall (Gonghui tang) around the site where once stood the old Office of Governor General of Taiwan (Zongdufu jiutingshe) while it was renamed by the Guomintang government aft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is process not only manifested two decisive momen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Taiwan, but also involved the working of the politics of the making of space and historical mem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memory politic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the sociopolitical life of Zhongshan Hall as the standpoint of my long-term research on “Taipei Memory Distri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examine how the Taipei Public Hall was constructed as disciplinary space of state power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zation. In particular, it looks closely into the transformative process from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ld Office of Governor General of Taiwa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aipei Public Hall by focusing on the function and meaning of the buil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litics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doing so, it demonstrates how the place around nowadays Zhongshan Hall was constructed into a stage to display disciplinary power of the ruling regime and it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discourse under the larger context of Japanese colonization. This article can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nument of the Victo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Retrocession of Taiwan that was built in 1999 as a realm of contesting memories to materialize divers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Retrocession of Taiwan. It can also be considered as the start point to explore the making of various memorial spaces in the “Taipei Memory District” such as February 28 Monument and Memorial Park, C.K.S Memorial, Ketagalan Boulevard, Monument to the Victims of White Terror, and Anti-Corruption Square.

Keywords: Taipei Public Hall, Zhongshan Hall, Taipei Memory District,
Production of Space, Realm of Memory